

全球对话

15.3

GLOBAL DIALOGUE

一年出版三期，以多种语言刊出

纪念 Michael Burawoy 特刊

Michael和 两个Karl

Klaus Dörre
Brigitte Aulenbacher
Roland Atzmüller
Fabienne Décieux
Raphael Deindl
Karin Fischer
Johanna Grubner
Nancy Fraser
Ngai-Ling Sum
Bob Jessop
Heidi Gottfried
Michelle Williams

Michael、公共 与全球社会学

Geoffrey Pleyers
Nazanin Shahrokni
Ruy Braga
Pavel Krotov
Tatyana Lytkina
Svetlana Yaroshenko
Fareen Parvez
Aylin Topal

致敬辞

Ari Sitas
Shaikh Mohammad Kais
Siyabulela Fobosi
David Goldblatt

议题开讲

> 属于社会学的时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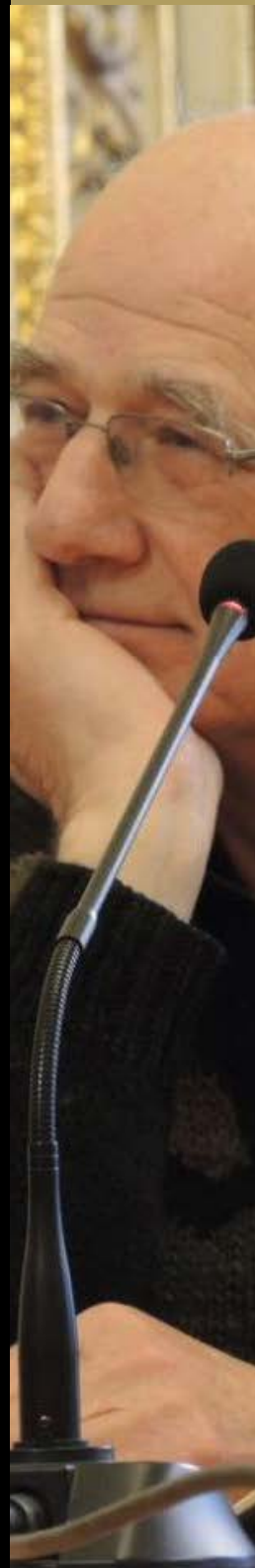
MAGAZINE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isa

第15卷/第3期/2025.12
<https://globaldialogue.isa-sociology.org/>

GD



> 编辑的话

纪念 Michael Burawoy 特刊

作为纪念 Michael Burawoy 于 2010 年创立的《全球对话》创刊15周年庆祝活动的一部分，我们在今年一月与他达成一致：本期特刊将专门用于回顾过去十五年来公共社会学与全球社会学所取得的进展。

Michael 对本期特刊的愿景充满了野心，正如他在私人信件中所说的：

「Breno，我认为《全球对话》的 15 周年举办一期特刊，是个绝妙的主意。也许你可以从各区域收集稿件（尽管这可能是个挑战），或者将重点放在动盪时期公共社会学面临的一些主要挑战上，例如检视当今的重大议题——战争、气候变迁、不平等和堕胎——所有这些都应透过全球视角来审视。另一种选择是邀请那些可能写出有趣内容的人来撰稿。还有一个可能性是向各研究委员会（RCs）发出征稿通知，请他们提供文章。你可以征求提案。尽管大胆地想吧！」

不幸的是，Michael 于 2025 年 2 月 3 日在一场肇事逃逸事故中悲剧性地离世了。在他逝世后，各方的悼念与追思如潮水般涌现，真挚感人。2 月 8 日，国际社会学学会（ISA）组织了一场线上追思会以纪念 Michael Burawoy。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来自全球各地的同事、学生、行动者和组织都在缅怀他那敏锐的才智、慷慨的精神，以及对社会正义的奉献。

Michael 作为导师、公共知识分子和转型学者所产生的影响力，启发了全球数以千计的社会学家。他的遗产涵盖了他在劳动与民族志方面开创性的工作、对公共社会学的深切承诺，以及透过他的指导所培养出的全球思想家和行动者社群。

因此，本期特刊如今不仅是为了庆祝公共社会学的现实意义，更是为了纪念 Michael 的生平与遗产。我们借此同时庆祝《全球对话》的 15 周年，并透过 Michael 的学术生涯与贡献来反思公共社会学和全球社会学的发展。为此，我们邀请了 Michael 来自世界各地的同事、学生和朋友，分享他们对其成果的见解、分析，以及与他共处时刻的个人回忆。

本期特刊围绕三个主题脉络书写：第一条脉络由《全球对话》的前任编辑 Klaus Dörre 和 Brigitte Aulenbacher 慷慨主编，探讨 Michael 对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投入，审视其理论的严谨性与实践的相关性。这些文章借鉴了他与

两个 Karl——Karl Marx 与 Karl Polanyi 的对话，在反思 Michael 知识影响力的同时，探讨了劳动、剥削、市场基本教义派以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转化潜能等问题。本部分收录了 Nancy Fraser、Bob Jessop 和 Michelle Williams 等学者的文章，共同讚扬了 Michael 分析视野的深度与广度，以及他连结批判理论与当代社会斗争的能力。

第二个主题脉络聚焦于 Michael 在公共社会学和全球社会学方面的开创性成果。本部分的文章反思了社会学作为一种全球性志业所面临的挑战与可能性，强调社会学必须关注不平等、社会运动和跨国对话等急迫的议题。这些文章突显了 Michael 在方法论上的创新，他对社会学参与公民社会的坚持，以及他对跨越各大洲——从欧洲到南美洲、亚洲和非洲——的学术辩论所产生的影响。总而言之，它们共同阐明了 Michael 的行动如何在动盪时期为理解世界提供了指南和框架。

第三条脉络汇集了个人的见证与反思，强调 Michael 学术中的人本维度。透过相遇、辩论和实地考察的经历，这些文章揭示了他在与学生、同事和行动者的关系中所展现的温暖、指导和启发。它们展示了他的行动如何在从南非到孟加拉的在地斗争中产生共鸣，以及它如何持续引导社会学家在批判性地思考社会的同时，坚守转型行动的承诺。

Michael Burawoy 启发了一种既严谨又致力于社会转型的社会学愿景。本期特刊旨在庆祝他非凡的一生和成果，并重申我们对公共和全球社会学的集体承诺——一种不仅分析世界，而且寻求改变世界的社会学，播下新思想、新辩论和新行动的种子。在社会学家和社会学学科遭受攻击的时代，重申 Michael 极力倡导的那种批判性社会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因此，本期特刊也收录了国际社会学学会（ISA）于 2025 年 7 月 6 日在拉巴特第五届 ISA 社会学论坛上发表的《社会学时刻宣言》。

我们希望这里呈现的见解、反思和研究，能够激励全球的社会学家们推进一种勇敢、批判且具有转化性的公共和全球社会学。■

Breno Bringel、Carolina Vestena 和 Vitória Gonzalez
《全球对话》的主编与助理编辑

> 《全球对话》以多种语言发布于[官方网站](#)。

> 投稿请寄信至：globaldialogue@isa-sociology.org

> 编辑团队

主编：Breno Bringel.

助理编辑：Vitória Gonzalez, Carolina Vestena.

副编辑：Christopher Evans.

执行编辑：Lola Busuttil, August Bagà.

顾问：Brigitte Aulenbacher, Klaus Dörre.

区域编辑团队

阿拉伯世界：(黎巴嫩) Sari Hanafi, (突尼西亚) Fatima Radhouani, Safouane Trabelsi, Siwar Harrabi.

阿根廷：Magdalena Lemus, Juan Parcio, Dante Marchisio.

孟加拉：Habibul Haque Khondker, Khairul Chowdhury, Bijoy Krishna Banik, Shaikh Mohammad Kais, Md. Abdur Rashid, Mohammed Jahirul Islam, Helal Uddin, Masudur Rahman, Rasel Hussain, Yasmin Sultana, Md. Shahidul Islam, Farheen Akter Bhuiyan, Sadia Binta Zaman, Md. Nasim Uddin, Ekramul Kabir Rana, Alamgir Kabir, Taslima Nasrin, Suraiya Akter, Ayesha Siddique Humaira, Nusanta Audri, S. Md. Shahin.

巴西：Fabrício Maciel, Andreza Galli, José Guirado Neto, Jéssica Mazzini Mendes, Carine Passos.

法国/西班牙：Lola Busuttil.

印度：Rashmi Jain, Manish Yadav.

印尼：Hari Nugroho, Fina Itriya, Indera Ratna Irawati Pattinasarany, Nurul Aini, Lucia Ratih Kusumadewi, Rusfadia Saktiyanti Jahya, Ario Seto, Aditya Perdana Setiadi, Dominggus Elcid Li, Benedictus Hari Juliawan, Mohamad Shohibuddin, Gregorius Ragil Wibawanto, Hartmantyo Pradigto Utomo.

伊朗：Reyhaneh Javadi, Niayesh Dolati, Elham Shushtarizade, Ali Ragheb.

波兰：Aleksandra Biernacka, Joanna Bednarek, Sebastian Sosnowski.

俄罗斯：Elena Zdravomyslova, Daria Kholodova.

台湾：李宛儒，周芸瑄，郭志豪，赖奕玮，林韵柔，吕道咏，简芊楹，廖宇雯，李妮

土耳其：Gül Çorbacıoğlu.

「一种结合全球与地方视角，关于社会、社会中与为社会而着的社会学」

由Klaus Dörre和 Brigitte Aulenbacher 编辑的「Michael 两个 Karl」章节探讨了Michael 与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互动。



第二部分则聚焦于 Michael 在公共与全球社会学领域的开创性工作。



最后一部分收集个人的致敬辞与反思，强调 Michael 学术中人文层面的观点。

封面署名：Michael Burawoy，圣彼得堡欧洲大学，2015年。照片由Tatyana Lytkina拍摄。



Global Dialogue 由SAGE赞助

> 目录

编辑的话:纪念 Michael Burawoy 特刊 2

> MICHAEL 和两个 KARL

社会学马克思主义:尚待完成的是什么
Klaus Dörre, 德国 5

抗拒剥削与市场的基本教义派
Brigitte Aulenbacher、Roland Atzmüller、Fabienne
Décieux、Raphael Deindl、Karin Fischer 和 Johanna
Grubner, 奥地利 7

致敬Michael Burawoy:一份感谢
Nancy Fraser, 美国 9

Burawoy 的公共社会学与注意力经济
Ngai-Ling Sum 和 Bob Jessop, 英国 12

不受拘束的Michael Burawoy
Heidi Gottfried, 美国 14

Michael Burawoy 的社会学马克思主义之树
Michelle Williams, 南非 16

> Michael、公共 与全球社会学

Michael Burawoy, 这个时代的社会学指南
Geoffrey Pleyers, 比利时 19

Michael Burawoy:社会学作为一种志业
Nazanin Shahrokni, 伊朗/加拿大 21

Michael Burawoy:
在抵抗的马克思主义与公共社会学之间
Ruy Braga, 巴西 24

Burawoy 与全球公共社会学的实践:与俄罗斯的对话
Pavel Krotov, 美国, Tatyana Lytkina 和 Svetlana
Yaroshenko, 俄罗斯 27

Michael Burawoy:公共社会学与意志的乐观主义
Fareen Parvez, 美国 30

劳动过程与霸权生产:Burawoy 的贡献
Aylin Topal, 土耳其 34

> 致敬辞

與Michael Burawoy的相遇与辩论
Ari Sitas, 南非 38

Michael Burawoy:全球南方社会学者的灯塔
Shaikh Mohammad Kais, 孟加拉 40

紀念Michael Burawoy:一个探讨南非小型公车计程车产业
的马克思视角
Siyabulela Fobosi, 南非 42

可行乌托邦的元素周期表
David Goldblatt, 英国 43

> 议题开讲

属于社会学的时刻
国际社会学会 45

「没有Burawoy的公共社会学就像没有翅膀的鸟。
但幸运的是,他教导了许多年轻社会学家如何飞翔。」

Labinot Kunushevci (科索沃)

> 社会学马克思主义： 尚待完成的是什么

Klaus Dörre, 耶拿大学荣誉教授, 德国

马克思与Karl Polanyi是Michael Burawoy与他的好友Erik Olin Wright所共同发展的「社会学马克思主义」(sociological Marxism)的两大核心灵感来源。

> 马克思主义：根系、主干与旁枝

Burawoy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个生生不息的传统；它根植于青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人本主义，以及其对理论与实践的特殊理解。从这些根部孕育而出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巨大「树干」——在《资本论》中所展开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而这又长出了许多枝条：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马克思主义、凝固成教条的苏联马克思主义，以及作为对这些发展的反动而兴起的西方与第三世界马克思主义。有些枝条枯萎，有些则繁盛；每一条枝干都对应着Burawoy在其与Polanyi的批判性对话中所提出的三次市场化浪潮（第一次在十九世纪、第二次自1918年起、第三次自1970年代开始）。以Polanyi与马克思并读，是理解反思第三次浪潮的「社会学马克思主义」之核心。

> Polanyi后的马克思主义

Burawoy打破了传统马克思主义认为「对抗资本主义的力量必然产生于生产领域」的观念。对Burawoy而言，生产领域恰恰是「对资本主义的同意」(consent)被生产出来的地方。由于全球「剩馀」劳动人口的存在，半受保护的就业状态在工人眼中不再像剥削，而像是一份渴望得到的特权。主观上来说，并非那仍然对资本累积不可或缺的剥削，而是「市场的撒旦工厂」(Satanic mill of the market, 用Polanyi的话)之经验，形塑了人类千百样的生命状态。

> 社会学马克思主义

在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重新思考上，Burawoy加入了更多关键理念。第一，社会学马克思主义必须将「自然的商品化」(the commodification of nature)视为第三次市场化浪潮的决定性特征。因此Burawoy呼吁对市场施加限制，并使生产手段(the means of production)社会化，而这可能意味着扩张或限制某些基

本自由。第二，第三波的马克思主义将聚焦于超越市场与国家的民主公民社会。市场与国家并不会消失，但它们必须被置于民主的公民社会控制之下。第三，此种马克思主义将公民社会理解为同时具有全球与国家两重面向：一个为了捍卫人类免于迫近的生态灾难而存在的公民社会，最终必须具有全球的维度。第四，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能够从广受认可的市场批判著作中，汲取广泛的社会学知识。第五，Burawoy透过寻找能促成公民社会进行「分子式转变」的槓杆点，让社会主义社会的想像得以延续——也就是对「真实乌托邦」(real utopias)的希望。第六，他在全球各地发现了萌芽中的生活替代形式，因而把社会学式马克思主义发展为一种全球性的马克思主义。第七，此种马克思主义在方法上放弃了理论确定性与实践必然性，以便在理论与实践之间测试新的平衡点。

> 威权自由主义

透过他以社会学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构想，Burawoy留给我们一份必须承继的遗产，以求让未来仍然值得活下去。对我而言，有三项任务在此至为关键。其一，我们必须分析那些因自然与知识商品化，以及金融驱动的对劳动与货币的「土地掠夺」(Landnahme)所引发的新社会分化。

第三次的市场化浪潮已近尾声，抵抗市场扩张的反运动越来越多是从威权国家与政府内部涌现。同时，民主公民社会在其多元性与自主性上也正日益受到威胁。我们正开始经历第四波浪潮——依据第二波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Hermann Heller，这可称为「威权自由主义」。这个术语指涉一种国家，它在经济领域完全放弃自身权威，只承认市场的自由。今天，我们似乎正目睹这样的反动：面对充满冲突的社会—生态转型，经济正被从官僚羁绊中解放；而气候保护——若仍被追求的话——则被交给市场力量与科技创新。新重商主义的贸易政策正终结以市场为驱动力的全球化；精英协议取代跨国外交；寡头统治自内部掏空民主；一场原教旨主义的文化战正清算基本人权。阶级特权被巩固，性别歧视与种族主义变成国家意识形态，而布拉沃伊曾赋予在对抗商品化中扮演核心角色的大学，如今正被国家暴政所箝制。这波新的商业化浪潮以社会关系为中心。既然称说「已不再有足够的资源让所有人共享」，那么唯有地球上最具生产力的居民才被认为拥有生存的权利；而他们所处的繁荣区域，则会以各种可行手段与那其余易遭灾难的世界部分隔离开来。

>>

「威权自由主义只有在政治体制出现可信的替代方案时才能被击败」

> 阶级问题的复返

在一个充满战争与灾难的世界中，Burawoy留给我们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他所提出的观点：仅仅在旧体制的缝隙中寻求替代方案是不够的。虽然自下而上的社会主义建构仍然重要，但也愈来愈清楚，新寡头们的「威权自由主义」只能在整个政治体制内出现能够赢得多数支持的可信替代方案时，才有可能被击败。因此，放弃争夺国家权力将是失职的。为了抵抗理性不断遭到摧毁，隐藏在市场逻辑背后的剥削与支配必须再度被公开揭露。Erik Olin Wright对一套整合性的阶级理论的思考——不但将马克思与Polanyi连结起来，也连结Weber、Bourdieu，更连结「黑人」与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声音——在我看来，是这项工作至关重要的一环。

> 全球马克思主义

无论人们如何看待这些主张，发展一种具有全球自我意识的社会学式马克思主义，仍然是尚待实现的愿景，也是我认为Burawoy遗产中第三项核心任务。随着Michael骤然离世，我们正在见证一整个由(后)1968运动在学术与政治上共同塑造起来的社会学家世代的逐渐凋零。当然，新一代仍在成长，而对我这个年纪的社会学家而言，支持并鼓励所有以Michael的「社会学式马克思主义」作为反思基础的人，是值得从事的使命。我们能够透过倾听年轻世代来支持他们；透过批判那些自认掌握永恒真理的新「中央委员会」，以及批判那种将洞见依照时代风潮任意挑选、却不面对受压迫者日常社会苦难的马克思主义「超市」式想法。总而言之，我们亟需寻找能促成交流的平台与形式，使Michael所构想的那个表演性理念得以实现：一种指引人们走向克服资本主义及其战争与灾难之道路的全球马克思主义。■

来信寄至：Klaus Dörre <klaus.doerre@uni-jena.de>

对这些反思有兴趣的读者，也可以参考由作者与学生及青年社会学家共同进行的「透过社会主义达致解放」计画之成果，见：

<https://emasoc.de/sozialismus-von-unten-emanzipatorische-ansatze/>

> 抗拒剥削 与市场的基本教义派

Brigitte Aulenbacher·Roland Atzmüller·Fabienne Décieux·Raphael Deindl·
Karin Fischer 以及 Johanna Grubner, 奥地利林兹大学

麦克·布洛维的社会学既是马克思式的,也是波兰尼式的,且远不止于此。这篇文章将回顾他最令人印象深刻且最具启发性的研究成果,并以他对二十一世纪市场资本主义的分析作为最终的总结。

> 麦克与卡尔·马克思

麦克著作中的广度与持续性很难用几句话来概括:人们可能会迷失在他那些错综复杂的思想轨迹之中。难怪他将自己长年投入于劳动过程发展的研究形容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民族志学家的奥德赛](#)」(Odyssey of a Marxist Ethnographer),或将自己在(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更新中的角色理解为一项「行旅的通译员」(travelling interpreter)。

麦克的理论视角展现出他对马克思主义内部以及(古典)社会学内部的各种辩论的全面掌握。他对劳动过程的研究主要涉及几个马克思主义假设:资本主义的危机倾向性(crisis-prone nature)、阶级斗争的重要性、统治阶级霸权在工厂内和通过工厂运作的形成,以及革命性转型的条件。然而,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运用,从一开始就受到他对一些一般假设的批判性态度所引导。他对劳动过程的研究证明了,生产方式的结构特征总是以多样且可变的方式被具体实现。这一洞见排除了任何理论概念的教条式套用,无论是在科学实践还是在政治实践中。他一以贯之的长期视角,要求我们正视并回应资本主义的变革性动态。

> 以卡尔·波兰尼补充卡尔·马克思

自19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的根本转变——即麦克诊断为「[第三波市场化](#)」(third wave of marketization)——与「现实社会主义」(real socialism)的终结,促使他将研究焦点转移至社会与市场之间的关系。这一转向构成了他对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sociological Marxism)的概念化基础,并吸纳了安东尼奥·葛兰西与卡尔·波兰尼等多位思想家的洞见。对麦克而言,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是跨国性的(transnational),旨在于纳入去殖民化(decolonization)与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的经验、说明父权制所造成的社会分裂,并承认社会斗争的多样性以及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多种潜在形态。

麦克那颗「为我们的时代」重新概念化马克思主义之遗产的雄心,也建立在如下认识上:这一传统必须抛弃对理论确定性的执着。相较之下真正需要的,是在批判性社会理论、科学与变革性社会实践之间,展开一场平等主义的对话(egalitarian dialogue)。

特别是自2008年的金融风暴以来,麦克愈加广泛地借鑑卡尔·波兰尼的经典之作《[钜变](#)》(The Great Transformation)。在日本举行的第十八届社会学大会(XVIII World Congress of Sociology)上,他以主席演说《[面对一个不平等的世界](#)》阐述了他对波兰尼的当代理解,并总结了公共社会学的各种争议和辩论之成果,比如社会学在根本危机时期的任务。对社会学本身的反思,成为他以波兰尼式视角分析当代市场的基本教义派(market fundamentalism)的核心环节,反之亦然;两者最终导向他所谓的「波兰尼式全球社会学」(Polanyian global sociology):一种关于社会、立足于社会,并为社会而设的社会学。此一社会学与公民社会紧密相关并结合了全球与在地的双重视角。

> 市场的基本教义派作为「活生生的体验」

由于对许多国家的变革性变化有所洞察,麦克对波兰尼的「钜变」之解读展现出相当的原创性。他令人印象深刻地将过去几个世纪到当前的各种「运动」(movements)及「反向运动」(countermovements)的历史学反思与社会学反思结合起来。在他关于市场的基本教义派的波兰尼式理论中,最重要的部分在于结合了对三波市场化——在宏观层面(macro-level)与中观层面(meso-level)——的分析,以及对市场化作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活生生的体验」(the lived experience)之分析。从历史的视角出发,麦克展示了市场的基本教义派对波兰尼所说的「虚构的商品」(fictitious commodities)——土地/自然、劳动与金钱,以及他进一步纳入其中的知识——的商品化(commodification),激发了以争取劳动权、社会权及人权为形式的「反向运动」,无论是基于阶级的斗争,还是对法律保障和制度性规范的诉求。

>>

「一种结合全球与地方视角，关于社会、社会中与为社会而着的社会学」

至关重要的是，他对我们时代的「反向运动」的看法使我们能够理解，日常生活的经验刺激了各种形式的社会抗议。在市场的教义派的时代中，不仅是商品化，包括去商品化 (decommodification)、排除商品化 (excommodification) 以及再商品化 (recommodification) 的过程都能导致根本性的问题，特别是对于那些因失业而被排除在市场交易之外的人，或在面对无利可图、因而被忽视的生态问题时，更是如此。并非对公民社会的浪漫化——特别是在右翼民粹主义日益高涨的当下——，二十一世纪初的劳工与社会运动的广泛行动空间 (latitude) 为麦克展现了各种波兰尼式的「反向运动」，而这正是资本主义持续变革过程中的核心动力。

> 麦克关于且为社会运动所着的社会学

以波兰尼的分析为基础，麦克主张商品化已是我们这个时代决定性的经验。虽然剥削仍是资本主义批判的基本概念，但人们往往并未有意识地就其本身来知觉它——此乃麦克在《[制造甘愿](#)》(一书中发展的洞见。在其「一般理论」中，三波市场化并没有被孤立地看待，而是被理解为在一种辩证的 (dialectical)——也许甚至是逆行的 (regressive)——动态中相互连结。

麦克预计自然的商品化将在现阶段发挥主导作用。他强调一种有效的反向运动必须以全球规模生成，只有在那样的层级上，对自然的破坏以及金融的全球操弄 (global machinations) 才能受到有意义的质疑。而这样一种反向运动必须克服根深蒂固的地缘政治边界、国家制约因素以及由市场化所设计的短期逻辑。

面对天真的乐观主义，麦克主张一种不妥协的悲观主义。他借鑑了波兰尼和马克思，将波兰尼虚构商品及反向运动的概念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动态的分析进行了结合。只有透过仔细检查推动市场化的物质力量，我们才能开始评估当代社会运动是否——有意或无意地——助长或扭转其强化。

> 怀念麦克

我们多年来熟悉麦克的社会学，如今我们回顾着与他长期而丰富的合作。我们感谢他给予我们无数次见面的机会，让我们得以受益于他的研究、思想交换及合作，也感谢他那份知性的慷慨、学术投入以及激励性的幽默感。作为本校奥地利林兹大学的访问教授，麦克启发了奥地利国际卡尔·波兰尼学会 (International Karl Polanyi Society) 的创立。作为《全球对话》(Global Dialogue) 的创办人，他邀请我们为这份杰出的刊物撰稿。有太多话来不及说——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位卓越思想家已然离去。我们深切地怀念他。■

来信寄至: Brigitte Aulenbacher <brigitte.aulenbacher@jku.at>

> 致敬Michael Burawoy： 一份感谢

Nancy Fraser, 美国社会研究新学院

麦克·布洛维 (Michael Burawoy) 悲惨而无谓的死亡，使我们所有人都感到震撼和惊慌。对我而言，这个消息也带来了错失机会的遗憾。我长久以来欣赏麦克的知性才华、政治委身以及亲切为人。可我却浪费了与他发展更长远关系的机会。事实上，我们仅有过零星的接触：第一次是在 1990 年代中期于西北大学 (Northwestern University)，当时他作为访问教授到来，而我正准备离开转往新学院任职；后来，在一系列的学术会议和研讨班中，我们针对马克思 (Marx) 和波兰尼 (Polanyi)、葛兰西 (Gramsci) 以及杜波依斯 (Du Bois) 进行了讨论，尝试厘清民主社会主义变革的前景。这些会议本身都成果丰硕，也孕育了一些未来的可能性。在西北大学时，麦克曾于我人生一个艰难而关键的时刻挺身而出——那是一种出于无私与自发慷慨的行动。而在那些学术会议上，他与我展开精彩而热烈的辩论，推动我以更深刻、更具批判性的方式思考。直到如今，面对他的离去，我才深切体会他对我而言有多重要。也惟有此刻，我才真切感受到自己错过了与他展开更长久对话的遗憾。

> 共同的启发

无疑地，我与麦克之间有许多值得讨论的共同之处。诚然，他是一位英国出身的社会学家，曾在三大洲研究劳动体制，而我则是相对地方性的美国哲学家。然而，我们两人同为婴儿潮世代 (baby boomers)，也同样是新左派 (New Leftist)，并且在那段全球解放运动高涨的非凡时刻找到了自己的声音。正是出于这样的经验，我们立下了共同的志业，即发展出一个适合于「后共产主义」(postcommunist) 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将过去社会主义变形的惨痛教训，与那些来自新社会运动中虽尚未充分发展却不可或缺的洞见整合起来。然而，如今使我最深受触动的，是我们最终都从许多相同的思想家那里汲取养分，作为磨砺思想的资粮。

Karl Polanyi 是最主要的。从他身上，我和麦克都看到了一个能够对马克思思想进行补充和丰富的思想家。我们没有被那种把「两个卡尔」(the two Karls) 视作彼此对立的见解所说服，而是各自发展出对《巨变》(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的解读，使其为对资本主义危机和社会斗争的一种延伸且跨马克思主义 (trans-Marxian) 的理解。

> 理解资本主义社会斗争的新方式

我们两人都认为，波兰尼对土地、劳动及金钱之虚构商品化 (fictitious commodification) 的论述，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态危机、社会再生产危机以及金融危机——虽然前两者与「经济」有一段距离——的结构性根源。但麦克对这论点的表述非常厉害，呈现出一个既非本质主义、又深具马克思精神的波兰尼。以布洛维的话来说，虚构商品化将土地、劳动和金钱都化约为交换价值，从而摧毁了其使用价值，包括作为真实商品市场的可能性条件。

同样地，对我们来说，波兰尼提出的「双重运动」(double movement) 概念——将市场扩张的推动者与试图保护社会免于其影响的拥护者对立起来——启发了一种理解资本主义社会中斗争的新方式。这些远离生产领域的斗争，即是我所谓的「边界斗争」(boundaries struggles)，其所争夺的并非剩余价值的分配，而是生命的语法 (grammar of life) 与社会制度的设计。对我和麦克而言，波兰尼的思想范型正好成为克服经济主义 (economism) 的契机，使反资本主义行动的场域与形式得以倍增，并超出古典马克思主义所关注的核心范围。

> 分歧的诠释：怀疑 vs 力量与应许

然而，我们之间存在一个关键的分歧。那就是我对波兰尼援引「社会」一举深感怀疑，我认为他的援引是本质主义式的，且模糊了非基于市场 (non-market-based) 的统治形式；而麦克则积极地将之理解为「活跃的社会」(active society)。波兰尼式的社会是在资本主义发展中被召唤出来，因此具有历史特定性 (historically specific) 的社会，这对麦克来说是充满动态活力的。随着行动主义的诸能量之爆发，预示了一种新的社会主义形式，在其中，假定为自行调节的市场将会屈从于一个真正地自行调节的社会。如今，在重读了他那篇写于 2003 年的出色文章《关于一个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For A Sociological Marxism”)，我才终于领会到麦克诠释中的那种力量与应许。



「自由派菁英显然缺乏意愿去捍卫曾经赋予他们权力的体制」

> 透过葛兰西来达成汇合

众所周知的是，那篇文章在将波兰尼与葛兰西聚合起来，后者是我与麦克共有的第二个主要参照点。这位义大利人，同样假设了社会作为发达的资本主义的中心。然而，与波兰尼不同的是，葛兰西辩证地理论化了「公民社会」：作为阶级竞争的场所，同时作为对这一竞争的约束。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公民社会是一个在经济与国家之间的调节空间 (intermediating space)，其中包含了学校与教会、法庭与福利机构、大学与研究中心、工会与专业协会、媒体与博物馆。正是在这一领域中，公共舆论与日常理解得以形塑并流传，布尔乔亚的常识在此将显得是具霸权性的，而受统治者对阶级统治的同意是（或多或少）被赢得的。但这不是全部。公民社会还作为一个竞争的空间，在其中，同意是会耗损的，而一种反霸权 (counterhegemony) 原则上能够被建构。作为一个同时是遏止又是竞争的地势，公民社会既表明了政治相对于经济的自主性，也表明了政治对各种特定的制度矩阵 (institutional matrices)、阶级结构的力场和历史的关头的嵌入性 (embeddedness)。对麦克和我来说，这种看法是基本的。我们都广泛利用了各种葛兰西式的概念，包括公民社会、扩展的（或整合的）国家、历史集团 (historic bloc)、权威危机、空位时代 (interregnum)、被动革命、属下阶层 (subalternity)、霸权与反霸权、常识 (common sense) 与良识 (good sense)、阵地战 (war of position) 与运动战 (war of movement)、福特主义 (Fordism) 与「美国主义」 (Americanism)。

麦克是因我一篇早期文章中对葛兰西的这些概念的使用而与我进行初次联系。我主要依凭直觉，半有意识地运用了葛兰西式的语汇 (tropes) 来分析晚期社会民主、福利国家资本主义中的「需求斗争」 (struggles over needs)。在具有历史特定性的「社会」领域中——原本被视为「私人」的事务在此成为了争论的对象——展开的这些斗争，所争执的不仅是需求的满足，还包括对需求的诠释以及在国家代理之内，使这些需求得以被满足与被驯化的治理术 (governmentality) 之形式。这些同样是边界的斗争，但与波兰尼所认为的相反，它们构成了一种「三重运动」 (triple movement)，其中涉及的不再是两组，而是三组对抗者：其一是激进的社运人士，为那些「失控的」需求之公共政治性质而奋斗，并主张以参与式民主的方式来部署它们；其二是保守派，他们试图将这些需求重新驱回家庭与市场的封闭空间，使它们再次被去政治化 (depoliticized)；其三是进步的自由派技术官僚，他们致力于将这些需求翻译成行政语言，并以官僚的方式加以满足。麦克比我更早也更深刻地理解到，这一分析多大程度有赖于葛兰西的思想。他在 2003 年对这项研究的讨论启发我在研究所课程中展开了对《狱中札记》 (The Prison Notebooks) 的系统性研究。对此我将永怀感激。

> 当霸权统治是一种强行而非合意

麦克也了解到，葛兰西的思想能有多少贡献，特别是在一个更灰暗的历史关头。在一个被川普主义 (Trumpism) 及其横跨世界的类似物 (analogues) 所主导的时代，回顾那位伟大的义大利共产主义者所做的对比——霸权统治在一个发达的自由民主社会中的「正常」运作，及其在法西斯主义中病态的政治下放 (political devolution) 之间——是很有帮助的。霸权统治在一个发达的自由民主社会中的「正常」运作，及其在法西斯主义中病态的政治下放 (political devolution) 之间的对比。麦克对葛兰西之主张的评注是一个很好的模范。透过阐明葛兰西关于霸权统治作为同意 (consent) 和力量 (force) 的平衡混合物 (balanced amalgam) 之概念，麦克提醒我们，对葛兰西来说，资本主义国家在其非病态形式中，就「只是外壕 (outer ditch)，而其背后那个强大的堡垒和防卫工程系统」，则是公民社会。只要该「系统」对统治阶级赋予同意，它就减少对直接力量的需要和能见度。

当然，如今那些堡垒和保卫工程正遭受着袭击——而且不是来自左派。至少在美国，所谓「MAGA国家」正在系统地吞并自由民主公民社会的核心机构，撕裂教育、科研与文化体系，还有私营企业、NGO 以及专业协会的自主性。通过瓦解布尔乔亚社会产生同意的「正常」管道，霸权的平衡被转向了对力量的依赖。这种力量如今作为残忍的现实与逼近的威胁，其能见度愈发清晰。警务军事化、抗议被镇压、移民被蒙年男子给掳走并驱逐出境。恐惧弥漫于整片土地。如果这显露了法西斯主义的端倪，那它预示着的是一种新型的法西斯主义，后者召唤出的可怕幽灵，并非现实的社会主义运动，而是一个与新自由主义结盟并获得了少数工人阶级的支持的「觉醒左派」 (woke Left)。

> 如何对抗原型 (proto-) 法西斯主义：调动布洛维的洞见

在这样的局势下，有效的对抗力量应该以何为中心？当然，不会是在自由主义精英之中。那个阶层的领导人物非但没有发起协调一致、具战斗性的公民社会自我防卫行动，反而放弃了任何关于集体行动的想法，并急于追求个人的利益协议。显而易见的，他们缺乏捍卫那曾经使他们得以获权的体系的意志。如果有效的对抗力量出现，它将来自别处。

这样一种对抗会来自下层吗？是否有可能出现一种由属下阶层 (subaltern) 领导的历史集团，足以对 (原型) 法西斯主义提出可信赖的反抗？可以推测，这样一个集团的主要目标并不在于恢复那种力量与同意的「非病态的」平衡，这种平衡「通常」强化了布尔乔亚权威并支撑着资本主义的阶级统治；相反地，它的目标将是克服这样的权威和统治。然而，为了这样的集团得以形成，属下阶层的主体

>>

必须克服当前彼此间那种有害的错认 (misrecognition) 之鸿沟,尤其是种族的鸿沟。这样的过程,还是可设想的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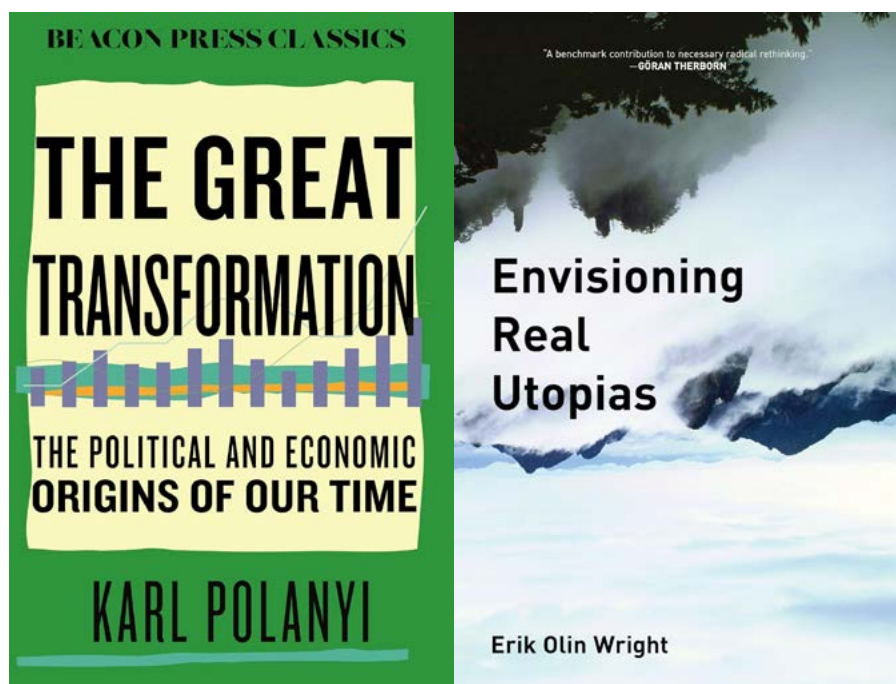
麦克对此会有许多想说的。但他的声音已然沉寂,这对左派来说是何等沈痛的损失。然而幸运的是,他为我们留下了一座严谨并具想像力的思想宝库,是我们能够借鑑的。对于这位才华卓绝并极具人性光辉的思想家,绝佳的致敬莫过于去调动他的各种洞见,来澄清当前的解放前景。■

来信寄至: Nancy Fraser <frasern@newschool.edu>

译注:「MAGA」是「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缩写,意即「让美国再次伟大」。此口号最早由 1980 年代美国总统雷根在竞选时提出,后来被川普重新采用,并发展为其政治运动的核心象征,成为川普主义的标志。

> Burawoy 的公共社会学 与注意力经济

Ngai-Ling Sum、Bob Jessop, 兰卡斯特大学, 英国



Karl Polanyi的《伟大转型》(Beacon Press, 2025年版)以及
Erik Olin Wright的《想像真正的乌托邦》
(Verso Books, 2010年)。

这篇文章旨在向Michael Burawoy致敬, 回顾他富有创见且具影响力的「公共社会学」理念, 并探讨这一理念如何进一步回应「注意力经济 (attention economy)」与「后真相 (post-truth)」的川普时代。在理论上, Burawoy区分 Karl Marx 与 Karl Polanyi 的观点, 并尝试加以综合与延伸; 特别是, 在探讨资本主义、商品化、剥削与不平等时, Burawoy讨论到市场化的三个阶段。

> Burawoy、Marx与Polanyi

Burawoy认为, Marx主要在研究生产过程中资本主义的剥削, 这是在第一批市场化中的讨论焦点。而Polanyi则是探讨市场关系中的商品化, 并分析第一与第二波的市场化; 他指出劳动力、土地与货币等「虚构商品」的存在起先并非为了贩售, 但它们被赋予价格并市场化, 进而导致「自我调节市场」的失灵, 迫使社会必须介入、加以规范, 以维持这些商品的使用价值。Burawoy进一步将Polanyi的分析延伸至 1980 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 视其为第三波市场化的开端。这一阶段的特征是自然与知识的商品化: 自然被转化为可交易资源, 导致环境破坏; 知识则透过智慧财产权与高等教育体制被纳入市场体系。

这种将Marx与Polanyi综合理解的理论取向, 在 2022 年Burawoy的晚期著作中仍持续发展。他借鑑了Erik Olin Wright关于「真实乌托邦」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主张这些乌托邦并非要废除市场或国家, 而是要透过集体自我组织, 让社会重新回归社会主义的轨道; 也呈现了反向运动 (countermovements) 如何抵抗各种形式的商品化。例如, 维基百科 (Wikipedia) 即是一个抵抗知识商品化的案例。Burawoy的社会学式马克思主义认为, 公共社会学是探讨虚构商品化并理解社会如何回应的最佳切入点。

> 注意力经济与川普时期的后真相时代

在他于 2025 年辞世前的最后一次访谈中, Burawoy 特别强调川普时代的重要性。他认为这可以被视为第三波市场化的最新阶段, 尤其体现在「注意力的商品化」上。在此阶段, 借由社群媒体中娱乐导向的游戏化机制——如线上测验、与网红合作、虚拟货币、积分制度与社交互动, 并伴随夸张的话语和影像, 以建立对使用者行为数据的分析。这些诱导机制让使用者持续投入, 并受困于注意力经济之中。从批判的观点来看, 人类的注意力因此成为一种可以被商品化并创造交换价值的稀缺资源。企业

>>

竞相吸引、捕捉、筛选并货币化数据与注意力。注意力商品化的现象主要是由硅谷的社群媒体巨头主导，例如 Meta 的祖克柏。这些企业在平台上蒐集并整理数据、在资料中心汇集，并掌握演算法设计与游戏化／说服力技术的关键，让人们的注意力持续停留在他们的网站上。他们同时提供使用者各种媒体或社会经济产品（如：数位赠品、影片、新闻讯息、社交功能），以吸引用户、影响他们的观点，甚至可能塑造特定的经济与政治影响。

在此脉络下，人的注意力便具有交换价值，因为它既是一种资源，也是一种货币。作为资源，它能推动销售并形塑影响力；作为货币，使用者的认知、情感与心理注意力可被换作特定的礼物或网路服务（例如线上活动门票、社交互动、搜寻结果），但同时，这也将部分的注意力控制权（例如暴露于广告与政治「速食」贴文中）让给网红（influencers）与注意力商人（attention merchants）。他们透过将注意力控制权转售给广告商以获取交换价值；广告商会依据获得注意力的程度（例如观看时间与深度）支付费用。同样地，网红透过 Instagram、TikTok、推特等讯息吸引观众注意，并试着从相应的经济与政治影响力中获取利润。

注意力经济也正在重塑政治与社会。川普正是后真相时代中「追求注意力的名人政治家」典型，他打造了「川普品牌」并在政治场域中运用它。他借由社群媒体（如：大众新闻、推特、Truth Social）的演算法进行筛选，并透过「回音室效应」吸引具有相近政治立场的群体。透过夸张地嘲讽对手、煽动群众的口号与标语（如「让美国再次伟大」），迅速地动员出以民粹为基础的情感，唤起选民内心的希望、恐惧或焦虑等情绪。在川普简化的迷因与戏剧性的论述下，其他政治人物只能选择被动地回应，进而让川普得以主导论述的、情感的与政治的场域。这种在注意力时代下重新形塑的政治沟通形式，不仅影响「个人—社会」层面的认知与情绪，社会亦沿着新的分歧线日趋极化。

> Burawoy 的公共社会学与后学科化的知识实践

回应 Burawoy 对公共社会学的号召，这些新的社会现况为反向运动提供肥沃的实践场域，在「后真相注意力经济」的第三波市场化时代中进行全球规模的抵抗。在此，「真实乌托邦」成为 Marx 与 Polanyi 之间的连结，提供了抵抗「认知与注意力商品化」的草根行动，即便它们不全是以全球规模进行。此类案例包括：追求平台去中心化的注意力行动主义（attention activism），以及地方层次的「数位排毒注意力庇护所」（attention sanctuaries of digital detox），两者皆可与跨国运动串联。除了地理规模上的讨论，注意力商品化也同时涉及微观与宏观层面：在微观层面涉及人的认知、感受与情绪；在宏观制度面中，透过掌握行为资讯，注意力的运算逻辑可被视作资源、货币与操弄手段。

这些变迁可能需要我们延伸出比以往更多的社会学的想像。反向运动的相关公众可能必须重新动员公共、政策、批判与专业社会学；同时，借由后学科化的方式，结合多元领域以提升学术与公共知识。这意味着要超越传统社会学，并关注不同学科的主张及其与社会学的关联性，包括批判心理学、教育研究、计算机科学、媒体研究、叙事分析、非正统经济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终其目标在于，面对这股将人类认知与注意力商品化的「超级市场化浪潮」，以提升对「真实乌托邦」的认识论反思；并且，在不同尺度和场域中，促进反向运动在制度性与能动性上的表现。■

来信寄至：

Ngai-Ling Sum <n.sum@lancaster.ac.uk>

Bob Jessop <b.jessop@lancaster.ac.uk>

> 不受拘束的 Michael Burawoy

Heidi Gottfried, 韦恩州立大学, 美国

Burawoy在威斯康辛大学开设的民族志研究所课程,是我最初研究尝试的启发——在〈「弹性」作为临时服务业的调节模式〉这项研究中,我试图整合女性主义与葛兰西式马克思主义的微观基础。他的启发不仅止于理论层面,还实际支持了我第一次的田野民族志尝试。当时他在家工作,亲自担任我的「派遣员」,将临时人力公司的工作任务转交给我。因此,我对这期刊的贡献,不仅出于学术上的批判对话,也源自于和他的私人情谊。我将呈现他在劳动研究的谱系,如何从葛兰西的《狱中札记》,延展到后来与波兰尼的思想对话。

> 民族志的转向

要回顾这些努力,很适合引用Burawoy在《制造甘愿》二十周年研讨会上对Donald Roy(这位「社会学家兼劳工」)的反思。他不逊地开场说道:「我们应该让先贤再现,倘若只是把他们供奉起来,将他们凝固于历史,便会错失他们对当前世界的真正意义。」他在那篇文章中的先见之明的结语,恰如其分地描绘了Burawoy这位导师、行动者与学者的特质:「他最初是研究工业劳动的社会学家,但最终将他的见解带回了家乡,探索社会学工作的新路径。」

Burawoy留给后人的东西不仅止于理论贡献。他结合芝加哥学派对日常生活的深描个案研究,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传统,使《制造甘愿》成为马克思主意出现民族志转向的重要先驱。在后来的《Global Ethnography》与《Ethnography Unbound》中,他与合着者将民族志的艺术实践植根于不同的地方历史——从匈牙利的社会福利办公室、旧金山街头的无家者、爱尔兰的软体工程师,到从印度喀拉拉迁移至美国科罗拉多中心城的护理人员。女性主义社会学家也运用Burawoy的微观政治视角,进行许多开创性的研究,如:情绪劳动的研究,以及在工厂、办公室与服务行业互动中(再)生产的阳刚气质与女性气质研究。

《Global Ethnography》与《Ethnography Unbound》都是芝加哥学派与曼彻斯特大学的学术系谱中的关键一环。《Global Ethnography》重新思考「田野」的意涵:以民族志作为全球性研究的方法时看似矛盾,因为它原本是为研究地方而设计的,本书的观点从而使民族志摆脱了单一时间和地点的限制。Burawoy接着带领读者展开一场眩目的理论巡礼,遍历Jameson、Castells、Harvey与Giddens等学者,寻找一个足以描述全球化的理论框架。在此过程中,

他梳理出这些理论间的共通主题,从而透过位移(displacement)、压缩(compression)、时空延展(distanciation)和消解(dissolution),将全球化体现为对时间和空间的重新组合。Burawoy进而从这些主题片段中拼凑出一套全球民族志的理论。

> 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们)

Burawoy以他那好学不倦的求知热情,深入研究了主要社会理论家的生平著作,使社会学式的马克思主义在我们这个时代重新焕发活力。〈A Tale of Two Marxisms〉这篇文章延续了他在比较葛兰西与波兰尼时所开展的主题。两人虽然都致力于回应特定历史情境中浮现的矛盾与异常,但若进一步探掘,便可看出他们的关注重点与理论限制各不相同。Burawoy在此引入西蒙·波娃与南希·傅瑞瑟(Nancy Fraser)作为理论对话的主角,指出一个他自己也未能完全克服的理论缺口:他批评葛兰西与波兰尼在理解其社会的政治时,都忽略了家庭内部的组织结构。葛兰西在〈Americanism and Fordism〉中,将「一夫一妻制家庭」的功能与福特式生产管理相联系;波兰尼则视家庭为抵御市场破坏与劳动商品化的潜在防线。然而,Burawoy的女性主义理论止步于家庭门槛之外,因为他对性别结构与阶级关系之间的理论理解仍显薄弱。

> 女性主义的转向

在Burawoy的启发下,更具力量的女性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微观基础出发,进一步推展至宏观结构,将照护工作的新自由化进程加以理论化。透过女性主义视角重新思考波兰尼的理论,会发现再生产劳动可以被视为是一种虚构商品,也是对照护工作市场化的一场反运动。照护工作在许多领域中早已被市场所吸纳。亲密关系的日益商品化,使更多日常生活与社会关系被卷入资本运作的循环之中。资本主义的再生产结合了有酬(商品化)与无酬(非商品化)的再生产劳动,作为维系生活持续的过程。无酬的家务劳动只是家庭生产的一项投入,同时仍须依赖以有酬劳动所得去购买的商品——两者皆为资本主义下家庭生存的必要条件。然而,资本企图从商品化的再生产活动中获利的意图,与非商品化劳动在支撑父权化、种族化的资本社会关系所发挥的补偿性作用之间,存在着根本的矛盾。阶级差异(交织着性别与移民身分)正是商品化与非商品化家庭照护劳动的核心动力。再生产活动的私有化与商品化,其形态深植于阶级结构之中,而阶级又常与种族划界重叠。低收入家庭倚赖非正式、非商品化的劳动;高收入家庭则能购买市场化服务,并更直接地从税收减免与现金补贴中获益——但这往往意味着更高度

「为我们时代带来的社会学马克思主义新观点」

的商品化。在这样的历史关口，反霸权运动正重新构想照
护劳动与再生产劳动的社会组织方式。

> 持续的遗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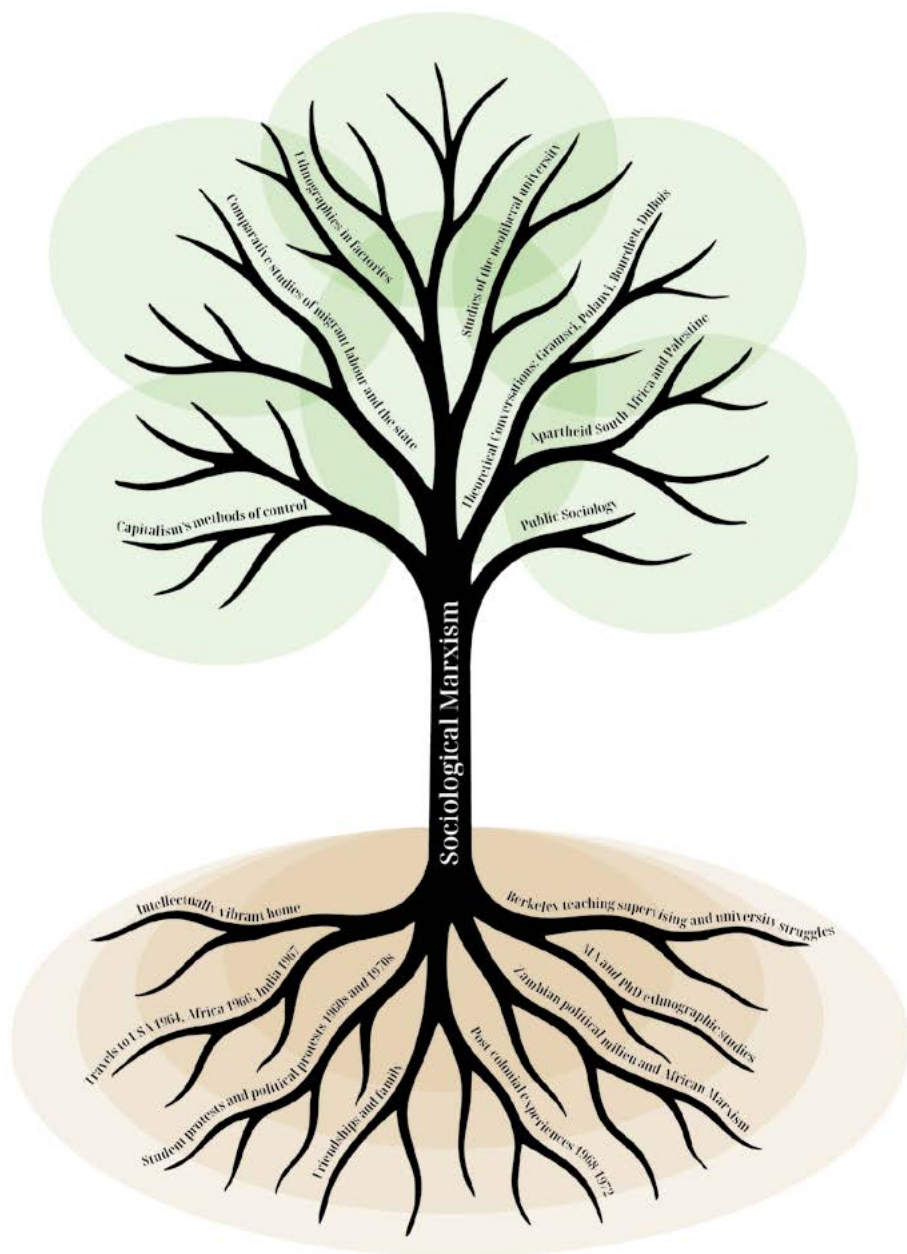
这篇简短的知识传记，置身于与Burawoy相似的政治环境——同样被威权幽灵所笼罩的时代。Burawoy那经由葛兰西、波兰尼与女性主义视角所折射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呼吁我们以批判的取径，「真实地」去追寻他与挚友Erik Olin Wright共同想像的真实乌托邦。无论是在尚比亚的铜带区、芝加哥的机械工厂，还是在他晚年呼吁社会学家为巴勒斯坦发声的倡议中，都可见他一以贯之的信念：唯有透过历史性的书写，揭示过去曲折事件之间的连结，才能照亮通往未来的可能道路。■

来信寄至：Heidi Gottfried <Heidi.gottfried@wayne.edu>

> Michael Burawoy的 社会学马克思主义之树

Michelle Williams, 金山大学, 南非

Burawoy的《社会学马克思主义之树》。图片来源: Michelle Williams。



16

Michael Burawoy 这位精神不辍、智慧非凡的学者，他在加州奥克兰遭遇了一场肇事逃逸的冷酷暴力事件，并于 2025 年 2 月 3 日离世。1995 至 2005 年间，Michael 是我硕士与博士学位的指导教授。即使在我离开柏克莱前往南非后，他仍定期前来造访。多年来我们成为至交挚友，他对我的教诲与指导也时终不曾间断。他既是最严厉的批评者，也是我最坚定的盟友。

尽管我尝试在此梳理 Michael 毕生对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的贡献，但这份文字无疑存有偏颇——它更多地反映了一位学生和友人对恩师的片面追忆，毕竟我从他身上所获良多，难以尽述。Michael 总能在我提交的任何文稿中找到可精进之处，我想这篇作品也必然不例外——但我真心希望，他能对我所描绘的「Burawoy 社会学马克思主义之树」感到一丝会心与莞尔。



> 理论的根基

Michael Burawoy 是一位罕见的学者。他毕生坚定不移地投身于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以其过人的智慧深入钻研这两个领域，并找到了极富成效和创新性的结合方式。他对两者的承诺，部分源于其个人经历——Burawoy 是透过亲身经历接触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的，这些经历深深烙印在他的正义感和对社会世界的好奇心中。他的父母是俄罗斯犹太人，于 1920 年代从俄罗斯迁居德国并获得化学博士学位，但随着希特勒崛起，他们又在 1930 年代离开德国前往英国。他的家庭是一个充满智识活力且具有政治热忱的环境。1964 年夏天，十七岁的 Burawoy 搭乘挪威货船横渡大西洋，并在美国各地为纽约书商推销书籍，就这样度过了一个暑假。当时的美国正处于社会能量爆发的时期，自由言论运动、民权运动、反越战抗议和城市反抗行动风起云涌。这次旅程在他心中埋下了社会学想像的种子，并在接下来几年他搭乘三等火车游历印度、以及搭便车横越非洲的经历中，找到了坚实的立足点。

Burawoy 从剑桥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先是在南非约翰尼斯堡担任了六个月的记者；随后转往刚独立的尚比亚，在一间经营铜矿开采的大型跨国公司人事部门任职。如同他在 1964 年夏天在美国感受到的社会活力，当时的南部非洲正因反对种族隔离和反殖民斗争的政治热潮而激昂。正是在尚比亚，Burawoy 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后殖民动力以及阶级与种族的交织。他的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之旅在他于尚比亚大学注册社会学硕士学位时正式确立。这个仅有三名成员的社会学系，让他深入了解了马克思主义、延伸个案法、民族志，以及种族、阶级与种姓之间的复杂关系。在此过程中，他体会到社会学和社会理论在理解世界上的巨大力量，对社会学的热爱也从此奠定！对 Burawoy 而言，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提供了理解世界和奠定改造世界、使其变得更好的强大工具。确实，正是透过他个人探索世界的旅程，发展出他对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坚定不移的忠诚。他让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展开对话，开创了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新领域——这是一种非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它将社会与国家 and 经济并置。他从未偏离这一学术航道，对于学术界中常见的浮夸修辞姿态也从不假以辞色。

在接下来的五十年间，Burawoy 成为他那一代最重要的社会学家之一。他身兼多重身份：一位传奇教师、一位尽职尽责的领导者、一位充满同理心的朋友与同事、一位非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及一位卓越非凡的学者。

> 理论的主干

Burawoy 是一位热情洋溢、甚至是充满布道精神的社会学家，以及一位才华横溢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毕生都为解放性的未来 (emancipatory futures) 的疑问与渴望所驱动。他认为社会学的职责是让不可见的现象变得可见，而马克思主义的角色则是提供理解不可见现象背后社会力量的工具。Burawoy 的创新之处在于，他总是能以不寻常的方式提出寻常的问题。举例来说，当他在尚比亚铜矿场工作时，他没有着眼于工人如何回应殖民统治的结束，而是将焦点转向管理阶层如何回应，这使得他揭示了「向上流动的种族壁垒」(upward moving color

bar) ——即随着非洲人进入管理层，种族歧视的壁垒也随之升级。他这种不寻常方法的另一个例子是：在他对芝加哥工厂的民族志研究中，他没有去寻找车间里工人反抗的迹象，而是转而探究「工人为何如此努力工作」，试图更深入地理解资本主义及其控制方法。

Burawoy 深知，只要资本主义存在，马克思主义就必然存在。如同资本主义随着时间演进一样，马克思主义也必须重塑自我，以反映时代的根本问题。对 Burawoy 而言，这种重塑具体体现在他的社会学马克思主义之中。借鉴 Gramsci 和 Polanyi 的思想，Burawoy 的马克思主义着眼于历史特定的社会观念，借此理解资本主义经久不衰的原因，以及在资本主义之外实现希望的可能性空间。他的民族志方法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微观基础，而他的延伸个案法则将这些微观过程的研究提升至宏观社会学的层面进行阐发。借由这种结合，他为马克思主义带来了历史特定的视角，有助于阐释一个动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同时，他为社会学引入了一种在尚比亚锤鍊而成的人类学方法，凸显微观社会学研究对于社会理论的重要性。对 Burawoy 来说，理解「社会」及其在资本主义中的作用，是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两者的关键所在。在他 2003 年的论文《社会学马克思主义》中，他解释「社会」栖居于经济与国家之间的制度性空间。他借鉴了 Gramsci 对渗透国家的公民社会的理解，以及 Polanyi 对遍及市场的「积极社会」的论述，并主张社会主义认为市场和国家必须服从于社会。

> 理论的枝干

Burawoy 首先透过他对劳动体制和工作场所民族志的研究重塑马克思主义，随后转向公民社会以及在晚进资本主义中产生的各种运动。这一转变标志着他将超越资本主义的关键，从工人阶级和生产地点转移到公民社会。Burawoy 在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第一阶段中，将重点聚焦于工作场所，同时结合了其延伸个案研究法的民族志方法。透过与工人们一同在工厂车间工作，他观察到资本主义是如何在生产现场持续适应变迁情境的同时，亦能获得劳动者的认同。Burawoy 透过对尚比亚铜矿场、加州和南部非洲的移工、以及芝加哥和匈牙利工厂的一系列工作场所的比较研究，发展出一个「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学说帮助人们透过生产车间的微观基础，来阐明资本主义不断演变的动态过程。

1980 年代末到 1990 年代初，在俄罗斯进行的一系列民族志研究遭遇挫折后，Burawoy 开始面对社会主义退化为资本主义，而非资本主义进化为社会主义的探问。苏联的解体对 Burawoy 而言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他因此放下了手中的生产工具，将研究重心从民族志方法转向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探讨。他首先从深入思考社会学马克思主义开始，并积极参与 Erik Olin Wright 的「真实乌托邦」计画。随后，他的研究转向马克思主义与一系列重要学者——Gramsci、Polanyi、Bourdieu 和 Du Bois——之间的对话。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和新一代反抗运动的出现，Burawoy 认识到超越生产车间的抗争的重要性。因此，他的理论探索也标志着一个重大转变：从生产地点转向公民社会，将其视为新历史主体出现的重要场域。Michael Levien 在其 2025 年的文章〈Michael

Burawoy: 社会学马克思主义者》中提出了类似的观点，指出 Burawoy 的理论介入引导他进入了重建马克思主义的有趣支流。正是在这个时期，他发展出了他的「马克思主义之树」——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树干，从中生长出多个分支：德国、俄罗斯与苏联、西方和第三世界马克思主义；Bakunin 和无政府工团主义；以及社会民主主义。他使用这个树的比喻来展示马克思主义的演变历程，以及某些分支如何枯萎而其他分支又如何生长的动态过程。

随着 Burawoy 的学术地位攀升至社会学界的顶峰——先后担任柏克莱社会学系系主任、美国社会学学会 (ASA) 主席，以及国际社会学学会 (ISA) 主席——他也将焦点转向新自由主义大学，以及更具体的社会学学科本身。南非的影响再次标志了这次转变，并促使他发展出关于公共社会学的理念。在 1990 年代和 2000 年代，Burawoy 定期访问南非，接触到一种充满活力的社会学，这种社会学深度参与其周遭的社会。这种经验与全球北方的社会学形成了鲜明对比，促使他发展出一个社会学四种类型的图示性分类框架：公共社会学、批判社会学、专业社会学和政策社会学。对 Burawoy 来说，公共社会学是最重要、也最核心的社会转型力量。他将公共社会学定位为动员公民社会、对抗日益兴盛的新自由主义 (Burawoy 称之为第三波市场化) 以及确认民族国家重要性的关键堡垒。同时，他也呼吁发展一种立足于本土但指向全球的全球社会学。

> Burawoy 的社会学马克思主义之树

Burawoy 非凡的知识旅程，或许能以「Burawoy 社会学马克思主义之树」作为最佳的描绘。如同他描绘的马克思主义之树一样，他透过社会学马克思主义，从坚实的学术著作中，长出了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的根基。对 Burawoy 而言，他思想之树的根基包括：一个充满智识活力的童年家庭、早年的海外游历、与后殖民社会的遭遇、在尚比亚接触到的参与式社会学和非洲马克思主义、学生与政治抗议、视教育为转化力量的理念、民族志与延伸个案研究法、比较研究的力量、社会理论的能量，以及对资本主义力量的理解。这些根基向上生长，形成了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树干。从树干上，长出了粗壮的分支，这些分支包含了：对尚比亚、芝加哥和匈牙利工厂微观力量的调查研究、对移工与国家的研究、与 Gramsci、Polanyi、Bourdieu 与 Du Bois 等学者的理论对话、对新自由主义大学的批判性研究、对南非种族隔离与巴勒斯坦的比较分析，以及公共社会学的倡议 (详见图表)。

Burawoy 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固定的典范，而是一个不断演变的理论传统，它有助于阐明对资本主义运作及其控制方法的具体探究。透过这种方式，社会学马克思主义得以活化，成为一棵不断生长与分枝的大树，新的思想持续从中萌芽，而过去的分析则被「重新造访」并重塑。

尽管我在这篇短文中试图描绘 Burawoy 对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非凡贡献，但这只是浅尝辄止。从他浩瀚的著作中，仍有太多值得我们学习。对于我们这些有幸成为他的学生和同事的人来说，他杰出的教学、指导与监督为我们留下了启发性的指引，以及一个可供汲取养分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学术宝库。■

特别感谢 Joanne Morrison 协助绘制树状图，以及感谢 Vishwas Satgar 和 Peter Evans 对本文提出的宝贵意见。

来信寄至: Michelle Williams <michelle.williams@wits.ac.za>

> Michael Burawoy,

这个时代的社会学指南

Geoffrey Pleyers, 比利时国家科学研究基金会 (FNRS) 与天主教鲁汶大学, 以及国际社会学学会 (ISA) 主席 (2023-2027)。



Michael Burawoy 于 2024 年 8 月 28 日在葡萄牙波尔图。
照片由 Geoffrey Pleyers 拍摄。

Michael Burawoy 于 2025 年 2 月 3 日突然离世。

玉 际社会学学会 (ISA) 悼念这位最具影响力、最鼓舞人心的主席之一。他是一位杰出且富有创造力的全球社会学家, 是倡导与人民和公民社会息息相关的公共社会学的先驱, 更是培育了数代社会学家的启蒙者, 是一位非凡的伟人。

Michael Burawoy 生于 1947 年, 最初学的是数学, 直到他在剑桥基督学院图书馆偶然读到一本社会学著作。1972 年, 他在尚比亚大学完成了社会学硕士学位, 当时他正在铜矿场工作。随后, 他转往芝加哥大学, 并以一篇关于芝加哥产业工人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 该研究后出版为其最具影响力的著作《制造甘愿: 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历史变迁》(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1979年)。此后, 他还在匈牙利和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的工厂进行了类似的延伸田野调查。

随着资本主义与剥削日益依赖知识的商品化, 他剖析了新自由主义政策对高等教育造成的冲击, 以及知识生产如何被蚕食以扩张了市场和国家的权力。他力挺公共社会学, 主张生产与公民、社会运动和公民社会息息相关的知识。

他在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担任社会学教授长达 47 年, 为数代学生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作为一位足迹遍及全球的学者, 他建立了一个致力于研究与分析的全球社会学家社群, 旨在理解世界并提供改变世界的工具。2022 年, 他获得了约翰尼斯堡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学位; 2024 年, 美国社会学学会 (ASA) 颁发他 W.E.B. 杜波依斯杰出学术成就奖。

他对我们理解社会学及其在社会角色的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研究彰显严谨的实证研究如何滋养理论辩论, 反之亦然。透过整合地方、国家与全球视角, 他提出了跨越学科的全面分析, 为公共政策讨论提供洞见。他主张「以理论视角阐释实证研究」。他对民族志的热情不亚于对理论的钻研。他既关注社会结构分析, 亦着重行为者研究, 并以马克思主义视角重新诠释与推广该理论。从尚比亚的铜矿场, 到为 Du Bois 作为美国与全球社会学奠基者的地位发挥关键作用, 再到为捍卫面向多元社会背景学生的公共教育而奋斗, 其职业生涯始终直面并剖析种族相关的不公。他对书本的热忱不亚于对于人的热忱——无论是田野调查中相遇的人、课堂里的学生、学术界的同侪, 抑或生命旅程中的过客。这四重身份在他的人生与工作中未曾割裂。作为人、作为教师、作为学者, 他始终慷慨大方。

Michael 是我们的指南针, 他时常提醒我们, 为何社会学在当代如此重要, 为何值得投入如此多的时间与精力来实践与传授社会学: 「社会学帮助学生理解社会如何形成集体, 理解种族、阶级与性别所扮演的角色。社会学是对不平等及其衍生压迫的科学探究。社会学研究的正是保守势力所推崇的排斥现象。但我们研究排斥现象, 并非为强化其存在, 而是为了辨识与揭露这些机制, 进而更深刻地理解如何挑战并扭转它们。」(2024 年 3 月 10 日于迈阿密)

Michael 离世之际, 正是我们最需要他的时刻, 我们需要他的领导力、他的活力、他为帮助我们理解世界所付出的不懈努力、他作为非凡教师的典范、他对相关公共社会学的信念、他对真正全球对话的开放态度、他基于数

>>

月工厂民族志田野工作所进行的深刻严谨社会学分析、他对社会与认识论正义的追求，为巴勒斯坦及世界各地和平正义的坚韧抗争，以及他独特的活力、奉献精神与热忱。

Michael 的领导力、奉献精神与热情，在 ISA 及全球社会学界留下深刻印记。作为协会线上期刊《[全球对话](#)》的创刊人——该刊今年适逢创刊十五周年——他致力「透过社会学视角促进当代议题的国际辩论与讨论」。担任国际社会学协会国家协会副主席（2006-2010）及会长（2010-2014）期间，他足迹遍及全球，传递对当代批判性与公共社会学重要性的热忱。其深刻分析与坚定信念启发了数千名社会学家，而他的仁厚、慷慨与正直更深深打动众人。

他离世后，全球社会学界骤然陷入哀悼，面对巨大的空缺。继 2 月 8 日（星期六）首场[线上追思会颂扬其生平与学术遗产](#)后，ISA 于 3 月在约翰尼斯堡举行的执行委员会会议，以及 7 月 6 日至 11 日在摩洛哥拉巴特举办的 ISA 社会学论坛，均安排了后续追思活动。此外，各 ISA 研究委员会、工作组及专题小组亦发起多项纪念行动。

Michael Burawoy 的贡献将持续塑造社会学家理解与参与世界的方式。诚邀您重温他在 2014 年横滨 [ISA 世界大会的主席演讲](#)，其中阐述了他对社会学、全球对话与正义的愿景。我们将开放[该演讲文章](#)及其在《[当代社会学](#)》期刊其他着作的阅览权限。

Michael 不仅留下了享誉盛名的著作，更倾注心力打造凝聚社会学者的平台与工具，ISA正是其中之一。唯有齐心协力，我们才能秉持坚定信念——在当今艰难时代，社会学至关重要——继承并发展他的学术遗产。■

来信寄至：Geoffrey Pleyers
<Geoffrey.Pleyers@uclouvain.be>

> Michael Burawoy, 社会学作为一种志业

Nazanin Shahrokni, 西门菲莎大学, 加拿大

Michael Burawoy 不只是一位社会学家;他更是一位社会学的缔造者——这不仅体现在他的理论贡献上,还体现在他塑造的学术机构、他悉心培育的人际网路,以及他缔造的全球团结之中。他将社会学这门学科转化为一个反思性且实践导向的场域——一个质问权力、关注边缘、连结批判与想像、桥接理论与行动的领域。

秉持着这种精神,我在本文中反思了 Michael 的贡献,并强调了他对这门学科、其方法论、教学法以及全球连结所留下的深远影响。

> 活生生的社会学:体现实践,反思方法

Michael的社会学不单是一种理论取向;它是一种活生生的实践,植根于运动、斗争和历史意识之中。他的最后一本书《公共社会学:在乌托邦与反乌托邦之间》,总结了他数十年来对 sociology 双重使命的反思:即批判现状的同时,也要培养替代性未来的想像。Michael为这些相互矛盾的脉动赋予了精确的含义:乌托邦对他而言,并非完美社会的蓝图,而是一种对话性的、集体想像替代方案的过程,是维持批判思想得以存续的必要力量。他告诫道:「没有乌托邦,社会学就只能镜映出绝望。」反乌托邦则与之对立,它是一种祛魅但必要的怀疑精神,用于节制天真的乐观情绪。对 Michael 来说,社会学就栖居在这两极之间的张力之中——在渴望变革与认识到阻碍变革的因素之间。正是在这种「是什么」与「可能成为什么」之间的张力里,他将社会学培养成了一种志业。

Michael 计画的核心是对学科本身的批判;他持续努力从内部重塑社会学。他挑战社会学的欧洲中心主义、封闭的经典,以及它对既得利益的复制。尽管他身处学术声望的中心,但他不断努力将自己去中心化——将 Du Bois、女性主义思想和全球南方知识论推到前台。他选择栖居于边缘,不断向外、向下延伸:深入社区、工作场所,以及那些经历不稳定状态的人们生活。

在他 2004 年的[美国社会学会 \(ASA\) 主席致辞](#)中,他着名地描绘了四种社会学:专业社会学、政策社会学、批判社会学与公共社会学。这些并非各自独立的孤岛,而是一种整合的、辩证的实践愿景。对他来说,公共社会学并非学科中柔弱的一翼,而是它的良知。他让社会学承担

起责任,坚持要求我们反思:我们为谁生产知识,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他对公共社会学的呼吁,是要求重新配置知识构成的根本基础。正如他经常所说,公共社会学不是外展服务;它是一个转化所有参与者的对话过程。

Michael的这份承诺也延伸到了他参与社会运动的方式。他践行着他的理论。他能够在研讨室与前哨线、国际社会学会议与工厂车间之间无缝转换。从南非和尚比亚的工会主义行动,到反种族隔离运动、占领奥克兰行动、研究生组织,以及声援巴勒斯坦,Michael 的工作模糊了学术与行动主义之间的界线。

这种对社会学的转化性愿景与他的方法论承诺密不可分。Michael 知识遗产的核心是延伸个案法:这是一种不追求常规演绎式向外概括的研究取径。相反,它是从日常生活中观察到的矛盾出发,延伸至对塑造这些矛盾的更广泛社会结构的理解。对 Michael 而言,反身性不是一种忏悔,而是一种知识理论。

这种方法论的承诺在他最持久的贡献之一中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他与九位研究生合作完成的《全球民族志》(Global Ethnography)。这本书引入了「在地全球化」(grounded globalization) 的概念:一种独特的方法,它不是透过抽象模型或宏观流动来理解全球进程,而是透过追溯全球力量如何在特定、在地化的经验中折射出来。总而言之,这些方法——延伸个案法与在地全球化——体现了 Michael 的信念:理论必须从底部建构,在与活生生的现实对话中产生,并且始终关注使知识成为可能的那种结构性条件。

> 传授社会学,践行对话

对 Michael 而言,教学并不从属于研究:它是转型社会学的根基。他坚决反对教学法是中立的观点。他认为,教学和研究一样,都镶嵌在更广泛的权力结构之中,尤其是在新自由主义大学的语境下。在他的著作《在压榨型大学中劳动》(Laboring in the Extractive University) 中,他将大学诊断为一个剥削的场域,学生和教师经常与学习过程异化。然而,他也同时在教室中看到了激进想像的潜力;一个将社会学探究培养成批判与关怀的双重空间。

>>

「麦可坚信理论必须从下而上建立，与真实生活对话」

他经常说：「我们的第一个公共群体是我们的学生。」在他眼中，每位学生都是一个值得倾听的故事，一个值得探索的挑战。他创造了一个集体学习的空间，在那里，思想可以激烈而慷慨地辩论，知识从不被囤积而是分享。作为他的学生，我逐渐体会到，Michael 最伟大的天赋在于建立一个社群，让我们可以在其中识别和培养彼此的洞察力与潜能。他将我们个人的挣扎，视为进入理论分析的切入点，而非干扰因素。

他在课堂中体现了团结的伦理；他经常在出版物中鸣谢 (crediting) 学生，承认助教的劳动价值，并将他们视为知识分子而非辅助人员来指导。

毫无疑问的，他是他那一代中最受爱戴的老师之一。但更重要的是，他重新定义了教学的可能性，并在街头传授了最令人难忘的课程：无论是在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 Sproul 广场的教学研讨会，还是在前哨线上。对他而言，教学法和传道授业与政治承诺及集体斗争密不可分。

对于我们这些门生来说，Michael Burawoy 并没有创造一个思想流派。他创造了一个实践社群；这个社群的定义并不基于追随者，而是建立在异议之上。他不想被追随。他希望有人与他辩论。我们并不都遵循特定的理论典范——甚至不包括深深影响他自身工作的马克思主义。让我们团结在一起的，不是方法论上的一致性或意识形态上的结盟，而是对世界的一种共同取向：一种对社会学思维之迫切性的信念，以及它阐明并重塑我们生活条件的能力。他的社会学深深镶嵌于、回应于并对其时代的政治和伦理挑战负责，我们的社会学亦是如此。

Michael 将教学视为一种劳动的承诺，与他对全球社会学的承诺直接相关。

> 全球社会学：从团结走向结构

对 Michael 而言，国际社会学 (ISA) 不单是一个行政平台，更是实现其全球社会学愿景的实验室。他反对仅凭扩大全球参与度——无论是透过会议、合作或引用——便足以达成目标的观点。相反的，他呼吁对学科的知识结构进行更深层次的转化。借鉴 Chakrabarty 的「将欧洲地方化」(provincializing Europe) 概念，Michael 主张社会学必须正视其来自北方的偏见，并重新分配知识权威。对他来说，国际化并非将边缘纳入一个主导模式，而是要培养一种根植于相互认可和民族传统活力的、对话性的、多中心的社会学。

Michael 呼吁从知识的垂直整合——即理论在全球北方生产，数据在全球南方收集——转向水平的交流结构，让理论和经验贡献能够从世界各地涌现。对 Michael 而言，全球社会学不是对「全球」进行研究；它是将社会

学作为一个学科进行全球化：连接声音、重新分配权威，并促成更公正、更具包容性的知识生产。他的全球社会学愿景并不是压榨式的。相反，他强调互惠性。正如他在《社会学的全球化》中所写：「除非我们也将知识的生产条件全球化，否则我们无法实现社会学的全球化。」

在他的带领下，《全球对话》创刊。这本多语种期刊旨在跨越语言和地缘政治的界限来传播社会学辩论。它被翻译成 15 种语言，体现了他对多语种、多声道、多中心社会学的坚持。他深知翻译不仅是技术性的，更是政治性的。他支持扩大国际社会学 (ISA) 的区域影响力、民主化其结构，并支持身处政治或经济不稳定环境中的学者。

他在 2008 年对伊朗的访问，捕捉了这种精神的精髓，我亦有幸随行。他拒绝让签证制度、制裁或国家镇压——以及政治、语言或学科边界——来决定他能够与谁接触。当伊朗社会学被国际制裁和国内镇压所孤立时，Michael 坚定地说：「如果他们没办法来找我们，我们就必须去见他们。」他也确实这么做了，下定决心要确保伊朗社会学家仍然是全球对话的一部分。在其他人眼中，那是一个被排斥的国家，而在他眼中，那是一个知识社群。他渴望观看、倾听和学习——以及他让周围所有人都感受到被看见、被听见和被认可的天赋——在他伊朗的同事们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在伊朗，Michael 作为一位充满同理心的对话者的角色，与他内心不懈追求的卓越民族志学家并存。他没有将自己侷限在德黑兰舒适的飞地中，而是冒险深入首都之外，乘坐往返于伊朗小城镇的公车。他向我们提出挑战：「不然你要如何与民众建立联系？」我们笑着提醒他：「Michael，你连一个波斯语单字都不会！」然而，事实证明，语言并非障碍。Michael 有一种不可思议的能力，能够栖居于各种空间，去吸收和反映当地生活的纹理。他从来不是一个疏离的观察者；他是周围正在展开的故事的参与者。无论是与公车司机聊天、和摊贩讨价还价，还是与大学教授交流思想，他都以他真诚的好奇心和标志性的幽默感，突破了每一道墙，铸就了超越言语的连结。他教会我们，民族志的相遇不在于语言的掌握，而在于人类的好奇心与尊严。

当被问及他想对 Ahmadinejad 总统和 Bush 总统传达什么讯息时，Michael 回答：「要求总统们必须修习社会学 101 课程。」在当今的环境下，政治领导人越来越多地削减社会科学的经费并使其合法性受损，他的俏皮话听起来就不再像一个笑话，而更像是对权力与批判知识之间疏离状态的预言式批判。

在 Michael 的造访后，伊朗社会学学会随即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公共社会学分会，如今这个分会已成为学会最有活力和最活跃的分支之一。我曾有幸翻译他对公共社会学

>>

的呼吁，并协助将此概念引介给波斯语学术社群。他的理念引起了深刻的共鸣：此后，学界组织了众多关于公共社会学的书籍出版和研讨会，包括 Michael 的论文和访谈在内等重要文本也被译成波斯语；伊朗社会学家们拥抱了他关于参与式、批判性学术的愿景；而在他逝世后，伊朗社会学会还举办了特别的纪念活动来缅怀他。国家报纸报导了他的学术遗产，强调他的访问和思想对伊朗社会学景观所留下的深远影响。

对 Michael 而言，全球社会学是一种实践——它是一种跨越边界的倾听、跨越差异的翻译，以及一种坚持知识除非被分享、被争论并以多种语言表达，否则它永远不是真正全球化的信念。

> 传承这项事业

在当今不平等日益加剧、威权主义崛起、气候崩溃以及全球流离失所的景象中，Michael 对公共的、批判的、充满希望的社会学的坚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他教导我们，社会学必须回应其所处时代的条件，而且它在危机时刻蓬勃发展；不是尽管有危机，而是正因为有危机。

传承他的遗产意味着要维护他所体现的价值观：

- 批判性探究要植根于对话与谦逊；
- 教学是相互转化的场域；
- 研究要跨越隔阂、与公众互动；
- 拒绝将分析与责任分离。

或许，这就是他在国际社会学会 (ISA) 留给我们的遗产：不仅是一套概念或类型学，而是一种实践社会学的方式——它既是批判性的、对话性的，同时又对它试图理解的世界负有深切的承诺。■

来信寄至：
Nazanin Shahrokni
<nazanin_shahrokni@sfu.ca>

> Michael Burawoy:

在抵抗的马克思主义与公共社会学之间

Ruy Braga, 圣保罗大学, 巴西

在 2025年2月3号的晚上, Michael Burawoy 不幸地在加州奥克兰自家附近遭遇严重车祸, 虽然驾驶事后逃逸, 但随即被警方逮捕。他的死亡代表着当代最重要的马克思社会学家的离去。Michael的学术生涯致力于在理论与人类解放实践之间维持有机的连结, 同时在官僚国家社会主义瓦解后, 重新将马克思主义带入大学中。

在 Michael 长达47年的学术生涯中, 他倾心于学生的培育与同侪的合作中, 最终在2023年于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社会学学院退休。自1970年代起, 随着他发表了重塑劳动研究的革命之作《[制造甘愿—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历史变迁](#)》, 他以严谨的实证研究以及开放的对话精神奠定了学术根基, 成为批判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人物。

在他的一生中, Michael是位传奇般的老师, 常以自身的魅力与幽默吸引满堂听众, 同时又细心地关注每位学生。他总在每堂课上逐次记下几位学生的名字, 并悄悄的在黑板上记下, 一直到学期末时, 他几乎可以记下所有学生的名字。作为一名指导者, 无数人都见证了他在协助学生研究时所展现的关怀与投入。过去的四十多年间, 他一共指导了84位博士生, 并常将他们的研究纳入全球的比较中, 进而催产出具影响力的集体著作。他在研究所开的专题研讨课与他在大学部开的课程一样受到欢迎。Michael的投入反映了一种深厚的团结精神, 这种精神既启发了他的研究, 也塑造了他的方法论取向。

> 一场创新且富有启发的旅程

在社会学的历史中, Michael是「延伸个案法」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延伸自人类学中的曼彻斯特学派, 并在他的社会学马克思主义中被系统化。延伸个案法不仅是种分析工具, 更是一种缜密的实证取径, 尤其善于连结微观经验与社会再生产及变迁的宏观过程。这种方法应用于民族志的反身性科学中: 在特殊中看见普遍、由微观推及宏观, 并连结当下与过去, 同时展望未来。透过延伸个案法, Michael 以工人的经验阐述了生产如何连结到更大的社会结构。作为一个参与观察者, 他强调马克思社会学的道德基础: 人类历史是社会建构的, 因而有重塑的可能, 并且理想上往更公正的方向前进。

团结、正义、平等和自由等价值对Michael来说, 与科学实践密不可分。社会学家不应否定这些价值, 而应反思性的接受这些价值所可能带来的启发。他的实证以及认识论基础建立在学术中罕见的场域: 尚比亚的铜矿场、芝加哥的引擎工厂、匈牙利的制钢场和俄罗斯的家俱工厂。他横跨四个国家, 从事机器操作员、熔炉工人以及人事专员的工作, 透过生产现场的经验精炼自身的分析视角, 并以此检视四个重大的历史转型: 非洲解殖、福特主义的巩固、官僚社会主义的崩解以及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他的理论结合了Gramsci、Luxemburg、Trotsky、Fanon和后期Du Bois等人的非正统马克思主义, 同时也纳入了C. Wright Mills、Alvin Gouldner和Karl Polanyi等人的激进社会学理论。

在1990年代初期, Michael与挚友Erik Olin Wright共同展开一项宏大的计画, 旨在重构「社会学马克思主义」, 此一理论被界定为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矛盾性再生产的分析。他们希望挽救在国家社会主义失败后被削弱的马克思主义, 与其中的解放潜能。Göran Therborn形容这是21世纪初期「抵抗性马克思主义中最有野心的计画」。此计画沿着两个互补方向所开展: Wright的「真实乌托邦」以及Michael的「公共社会学」。两者皆鼓励社会学界无论在学术圈内或外, 皆以批判性的态度与多元公众互动, 并以此作为社会变革运动中的一环。他们两人皆曾担任美国社会学会 (American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ASA) 的理事长, Michael随后更出任国际社会学会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ISA) 的理事长, 并在44个国家推广他的公共社会学理念。

> 公共社会学

公共社会学在Michael的想象中, 是一种以学术圈外的公众为对象的反思性且批判取向的社会学, 致力于实践正义、自由、平等、民主和团结等解放性价值。Michael常打趣地说, 如果政治学研究的是国家, 经济学研究的是市场, 那么社会学研究的就是公民社会以及其中的矛盾与历史挑战。不意外地, 公共社会学与全球各地抵抗劳动、自然、金钱和知识商品化的抗争运动相呼应, 尤其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同时, 他强调研究反动运动的必要性, 包含在2010年代兴起的威权民族主义, 与由其推动的全球极右派浪潮。他认为, 公

>>

「人类历史是社会建构的， 因此可以被社会重建——理想地以更公正的方式。」

共社会学有必要揭露潜藏于这些当代专制「病态征兆」(Gramsci) 背后的结构与过程，同时也能策略性的支持民主的再生。

2014年结束在ISA的理事长任期后，Michael返回至柏克莱，担任教职员协会的代表，为加州公立大学中处于不稳定劳动条件的教师们发声。他在2023年全力支持教学助理罢工的行动，再次展现了他对社会正义的坚定承诺。综观他的一生，他持续参与多样的行动：声援尚比亚的独立运动、反对南非的种族隔离、支持大学中女性反性骚扰的运动、加入反对乌克兰战争的动员，并谴责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在加萨进行的种族灭绝，这也是他[过世后发表的文章主题](#)。在全球社会学的历史中，没有人能像他那样，将多国的田野研究与参与人类根本诉求的政治行动结合在一起。Michael必将以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位团结精神的传授者以及一名将社会学转化为解放工具的公共知识份子为众人所铭记。

> 在巴西的Burawoy

Michael在2007年因参与位在勒西菲举办的拉丁美洲社会学会议(Latin American Congress of Sociology, ALAS)，而首次与巴西社会学界建立了直接的联系。此行期间，他在圣保罗、坎皮纳斯、阿雷格里和里约热内卢等地的大学发表演说。当时他担任了ISA的副理事长，并积极推动「公共社会学」。这也是他在过去几年形塑的计画，并在过去竞选ASA理事长时广泛讨论的理念。

自那次交流以来，Michael定期造访巴西，并经常受邀参与研讨会、会议以及各式学术活动。他在巴西社会学学会(Brazilian Sociological Society, SBS)以及全国社会科学研究与研究生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Graduate Studies and Research in Social Sciences, ANPOCS)的活跃身影也成了一种学术象征，使他成为巴西最具知名度的社会学家之一。透过这些交流，当地许多学者与学术机构吸收了Michael的观点，并进行对话沟通，使他与巴西社会学界建立了独特的关系。

巴西学界对Michael的认可并非只具象征意义。根据以2010到2024年间SciELO资料为基础的文献计量学分析，Michael是巴西学术期刊中被引用次数最高的前15位国际社会学家之一。这不仅展现了他研究成果的深远影响，也突显出他的公共社会学与巴西批判性学术传统对话的能力，巩固了一种具公共关怀且与全球紧密连结的社会学。

Michael在巴西的长期参与对圣保罗大学的公民权利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itizenship Rights, Cenedic)所发展的研究计画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该中心多次邀请他访问，最近一次是在2023年，并与他展开多方且丰富成果的合作。他的影响也塑造了我自身的学术轨迹，在他的启发下，我致力于重塑以实证研究为基础的批判社会学式马克思主义，并透过分析巴西工人阶级的转型以完善「个案延伸法」。

与Michael的对话显著的强化了Cenedic内部的公共社会学取向，这项计画的核心人物是Chico de Oliveira。Chico为我与Michael合编的《[为公共社会学而作](#)》撰写序言绝非偶然。这象征了拉丁美洲马克思主义的反思以及国际公共社会学这两种批判传统的交会，并发展出共享的知识与政治视野。

在2023年最后一次造访圣保罗时，Michael参与了我的新书《[无产恐惧：种族资本主义下的劳动与团结](#)》的发表会，该书聚焦于美国工人阶级转型的分析。本书直接与美国黑人社会学家W.E.B. Du Bois展开对话，Du Bois也是Michael近年最关注的思想家之一。在Michael过世时，他正准备撰写一本以Du Bois为主题的书籍。Michael对Du Bois的投入，为他的公共社会学注入了一项新的核心议题：透过纳入历史中被边缘化的知识传统，批判性的重建社会学典范。

这份思想遗产持续在巴西开花结果，近年来，像是AfroCebap小组等团体积极推动Du Bois著作在葡萄牙语世界的翻译与推广，并将他的思想与巴西社会科学相结合。他们透过强调种族议题，并分析资本主义与种族主义间的全球历史性关系，来拓展诠释框架。Michael和Du Bois思想的交会，不仅强化了全球连结的公共社会学框架，同时也提供巴西一个深化种族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框架，并进一步与国际理论和国内历史经验相连结。

> 最后一次见面

我最后一次亲自见到Michael是在2024年10月的约翰尼斯堡。在那顿他一如往常坚持要付钱的难忘晚餐后，我将他送到我们亲爱的朋友Williams和Vish Satgar的家门前。我当时之所以住在南非，是因为十多年前Michael让我看到了南非社会学研究的独特重要性，对此我仍旧深怀感激。

那天，我们边讨论他将于2025年7月参与的巴西

社会学大会细节，边互道了再见。他原本打算在会议上谈论巴勒斯坦人民持续遭受的屠杀，并对大学中能否开诚布公地讨论如此敏感的议题感到忧心。我向他保证，他一定会受到热烈欢迎，在那样的场合中，听众们都可望倾听他，并愿意认同他真正的身份：在他那一代中最伟大的马克思社会学家。■

来信寄至：Ruy Braga <ruy.braga@usp.br>

> Burawoy 与全球公共社会学的实践： 与俄罗斯的对话

Pavel Krotov, 皮蒂里姆·索罗金基金会, 波士顿, 美国; Tatyana Lytkina, 科米科学中心, 俄罗斯;
以及 Svetlana Yaroshenko, 圣彼得堡社会学家协会, 俄罗斯。



Michael Burawoy 于 2002 年在 Komi 的田野。照片由 Tatyana Lytkina 拍摄。

着 名社会理论家暨公共社会学倡导者 Michael Burawoy, 于七十七岁辞世。他毕生致力社会学研究, 揭露隐藏的社会藩篱、探讨多元不平等现象, 并促进社群间的连结——也包括了学科内部各领域的交流。

麦可既是我们挚友、导师与同侪, 亦将永远是照亮社会学领域中许多面向的璀璨明灯。他的学术贡献与思想将永存, 尤其对探讨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发展轨迹、公民社会在市场与国家压力下脆弱性之研究者而言, 更是如此。在此简短悼文中, 我们聚焦他非凡生涯的独特面向: 他与俄罗斯的渊源, 以及我们共同致力理解资本主义动态、俄罗斯人民生活经验, 并探索公共社会学推动社会变革潜能的协作历程。

> 国家社会主义下劳工运动的萌芽

1986年, 改革运动起始之际, Michael 与 Erik Olin Wright 一起前往莫斯科, 他们与苏联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学者展开合作, 共同进行苏联与美国阶级意识的比较研究。

历经十日「令人沮丧却发人深省」的讨论, 双方特别对于——马克思主义范畴的运用, 以及苏联学者公开剖析现实社会主义内在矛盾, 那相当犹豫的态度, 出现极大在意识形态与诠释上的分歧。

自此之后, 两位学者各自踏上不同研究路径。Wright 再也没有回到俄罗斯。相较之下, Burawoy 则致力于开启

>>



Michael Burawoy 于 2015 年在圣彼得堡欧洲大学的公开辩论中。
照片由 Tatyana Lytkina 拍摄。

对苏联工业全面性的民族志研究，类似于他在匈牙利的研究。他视苏联社会主义并非悲剧性的偏离了社会主义理想，而是其表现形式之一——国家社会主义——值得批判性实证考察。他提出关于劳动组织、工人意识，以及劳动运动在国家社会主义体制中比先进资本主义社会更为蓬勃发展的悖论等问题。

> 朝向市场资本主义的转型

1991年，Burawoy开始在科米地区的家具厂进行参与式观察，并透过观察将其验证纪录于著作《制造甘愿》(1979年)中，并于《辉煌的去》(1992年，与Janos Lukács合著)一书内又深化的阐述了的假说。他区分对劳动过程的控制(生产关系/生产的社会关系, relations of production)与劳动过程内的控制(生产中的关系/生产过程中的社会关系, relations in production)。在苏联体制下，工人以独特的方式展现了「生产中的关系」。由于体制性短缺与长期的效率问题，管理者为确保生产不中断，往往必须放弃部分操作控制权。这种**悖论的自主性**，使工人获得一定程度的现场权力，反而体现了行政命令体系的弹性与韧性。

其研究最初旨在比较晚期社会主义时期的苏联与匈牙利劳动状态，然而田野研究的结果却显示出：指令型经济正逐渐瓦解，被以物易物式的交换关系所取代。这样的转变并未促成工人自我组织，反而导致了混乱而非自我组织。工厂沦为无中央管理的碎片化场域，进一步催生了商业资本主义与寡头阶级的崛起。

1992年至1994年间，Burawoy的研究范围扩展至Vorkuta的煤田，当时矿工罢工与改革措施在此地激烈冲突。透过与世界银行专案合作，他们对十二座矿场进行社会学分析，凸显了休克疗法(shock therapy)的剧烈影响。工人们因市场自由化而幻灭，逐渐放弃集体抗争——「向历史天使低头」。随着市场自由化加剧了曾积极组织抗争工人的失序与绝望，他们逐渐陷入无力与顺从——「**向历史的天使低头**(bowing before the angel of history)」。

> 市场压力、性别转向与经济内卷化

随工业企业的崩溃，工资拖欠现象逐渐普遍化，取代工资的补偿有时会以高价食品的形式提供给工人们。此时，经济活动也转移至家庭领域。

自1994年起，Burawoy与Lytkina透过家访来调查劳工们的生存策略，发展出受Karl Polanyi《钜变》启发的后社会主义转型理论。Burawoy呼应波兰尼的观点：「市场若无被破坏或反抗，便无法建构社会」。

在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社会抵抗的形式表现为家务劳动的加剧、非正式经济的复甦，以及劳动、金钱、自然与照护的商品化——这些现象都深深植根于具有文化意涵的社会关系之中。访谈显示出鲜明的性别分化：女性成为事实上的家庭户主，弥补男性地位与就业的丧失；同时，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支援网路常取代了功能衰败的国家。而对于从事小规模贸易或服务业的劳动阶层女性而言，这种创业行动反而强化了家庭对劳动的依附，使她们更难脱离匮乏的循环。

Burawoy、Krotov与Lytkina将此现象概念化为「**内卷化**」(involution)——一种以牺牲社会再生为代价、仅为延续生存而进行的退化性适应。

> 新自由主义国家压力与排外逻辑

「内卷化计画」(The Involution Project)由科米科学中心(Komi Science Center)下属的北方社会经济与能源问题研究所(Institute for Socioeconomic and Energy Problems of the North, ISEEP)主办。Burawoy透过田野调查与开放式的协作对话，将原本的实证困难转化为理论上的概念创新。

随之而起的新研究，聚焦于分析 1996 年后俄罗斯选择性社会福利体系的运作。我们共同探讨城乡居民如何获

得或失去「官方贫困」的身分,以及政策如何在制度实践中重新塑造「贫困」的定义与意涵。

尽管Burawoy的研究根植于马克思主义,他在理论上秉持多元主义,认同将 William Julius Wilson的城市贫困理论应用于俄罗斯的状况上,展现了如何以实证研究重新活化理论分类。

随着劳工权益遭侵蚀、合法罢工也几近不可能,国家放弃了对劳动市场的监管。与此同时,贫困的定义日益收窄。更甚者,随着贫困人口规模与结构变化,国家多次调整「需援助者」(those in need of support)的登记规则。对低收入者而言,此举实际上等同于严格的规训,进一步扩大了社会保障权利的排除范围。官僚体系——包括国家机构、政策专家以及工会——的疏离态度,使社会陷入孤立的「原始生存斗争」([primitive struggle for survival](#))状态,不仅否认了贫困作为生存策略的正当性,并导致阶级认同逐渐消解。

> 知识的商品化与公共社会学的抗争

后来,Burawoy将研究焦点转向高等教育领域,在新自由主义体制下,大学里的知识与学术劳动正日益商品化。

2007年应斯Svetlana Yaroshenko之邀,他在圣彼得堡发表关于公共社会学的主题演讲。2015年再度造访时,他发表了《社会学作为志业》([Sociology as a Vocation](#))并参与[俄罗斯社会学未来发展](#)圆桌会议。

Burawoy强调,社会学承担着凝聚社会而非制造分裂的使命,它既是一门科学学科,也具备道德与政治功能。他主张,丰富的社会学知识应回归到边缘化的公众之中。尽管他深知俄罗斯公共社会学面临诸多结构性限制,但乐观的态度与突破困境的经验,仍使他坚信专业社会学与公共社会学可以共存并互相促进。

2015年,在学术压力日益增大的背景下,他呼吁社会学家抵制对学术绩效指标的盲目追求,并将自身的抗争置于历史脉络中加以审视,认知个体与社会的相互关联,同时发展基于实证、契合在地情境的理论——无论是借鉴外来理论,还是在俄罗斯脉络中加以重塑。

他倡导社会学家之间的团结与互助,积极参与自发形成的公民社会,强调集体探究所带来的变革力量及其公共意义。

> Michael作为理论具体化的体现

Michael Burawoy将对社会学的热情与对全球资本主义所衍生不平等的敏锐洞察,两者完美结合。他的跨国研究——包括在俄罗斯的田野工作——展现了社会学家作为一个潜在「具危险性」的知识阶层:他们与公民社会紧密相连,对不平等的运作机制保持警觉,并能将个人苦难转化为集体行动。

最重要的是,我们记得他的专注、开放、慷慨与智慧。他以真诚的尊重倾听,跨越隔阂、打破层级,并在日常互动中促进平等。他对结构与能动性的洞见,源自对工人生活的深刻、富有同理心的投入。

对我们而言,Michael Burawoy不仅是公共社会学的理论家——他更是公共社会学活生生的体现。■

来信寄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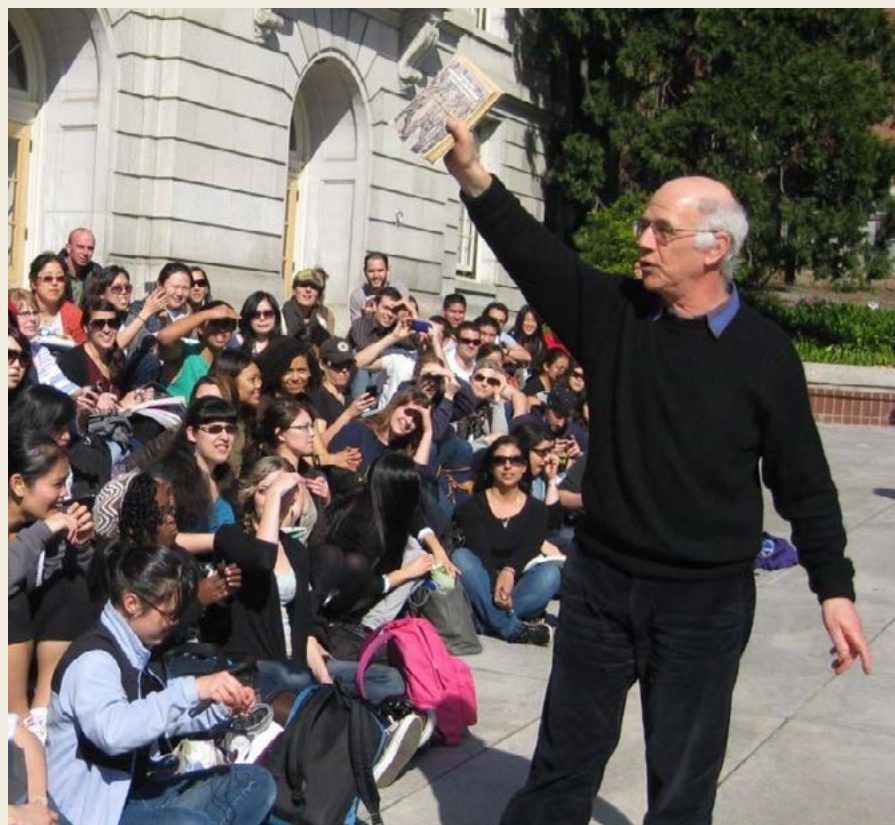
Pavel Krotov <pasha.boston1307@gmail.com>

Tatyana Lytkina <tlytkina@yandex.ru>

Svetlana Yaroshenko <svetayaroshenko@gmail.com>

> Michael Burawoy: 公共社会学与意志的乐观主义

Fareen Parvez, 麻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 美国



Michael Burawoy 在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 Wheeler Hall 外演讲。
照片由 Ana Villareal 拍摄。

Michael Burawoy 是我的博士学位指导教授,从 2001 年起便走进我的生命。我有幸与他共享了长达 24 年丰富而美好的对话。在我得知他噩耗的几小时前,我还寄出了给他的最后一封邮件,与他分享我对于一场巴勒斯坦教学研讨会的想法,他对此慷慨鼓励。就在我刚教完他那篇卓越的 2000 年论文《共产主义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的几分钟后,我收到了语音留言,接着读到了那封令人心碎的邮件。

协助缅怀他的遗产,对我来说既痛苦又暖心。跨越国界的交流对 Michael 而言始终至关重要,这份信念从最初便根植于他的心中,随后透过他在国际社会学学会 (ISA) 的工作,以及过去十五年来他到世界各地会见社会学家的广泛旅行,此一精神得以延续。

Michael 指导了大约 80 位博士生的论文。许多人因为对劳动或前苏联与后共产主义转型的兴趣而慕名而来。

也有许多人则因为他对民族志、全球比较研究,或因他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取径而选择他作为指导教授。我属于最后一类,这也意味着我当时并未深入接触 Michael 的许多实证研究。但现在我正沉浸其中,竭尽所能地发掘和钻研他的作品。每当我重读 Michael 的著作时,总会被他写作中蕴含的诗意所打动。他在现实生活中传递出的那种热情,在他笔下的文字中依然鲜活地跳动着。

> 具有道德责任感的民族志学者、社会学家,
始终是个马克思主义者

作为一位民族志学者,Michael 曾担任机器操作员、旋臂钻床操作员 (我甚至不确定那是什么!),也曾担任橡胶工厂与香槟工厂的工人,还曾在俄罗斯北极圈的家俱厂中工作过 (我曾和他开玩笑说,我很想去参观那个地方)。Michael 早期的致力于探讨关于尚比亚铜矿场中的种族与阶级问题。他撰文阐述了美国工厂中工人如何同意

>>

自身被剥削的根基、生产过程，以及维系这些剥削的各种国家干预与意识形态体制。他也论及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在匈牙利的情况，以及苏联向资本主义的转型。他持续深入地探讨 Polanyi 的思想和反社会运动不断变化的性质；并与 Bourdieu 进行了精心且长达数年的对话，最近则转向了 Du Bois 的社会学研究，以及更宏大的去殖民化经典学术工程。他撰写了许多关于民族志的著作，包括我最喜爱的《延伸个案法》，当然还有关于重建马克思主义的论述。Michael 还批判了大学的新自由主义化、南非的种族资本主义。最终，在他最后的项目中，是对巴勒斯坦的承诺；他将其理解为一个定居殖民主义的案例，并借此与南非的种族隔离进行比较分析，而最重要的是，他激励和提醒美国社会学家，我们有道德责任发声，以减少巴勒斯坦人民的苦难。

> Michael 著作中的诗意摘录

我想分享他作品中一些我最喜爱的如诗句般的段落：

「什么是实证科学？对于 Auguste Comte 而言，社会学将取代形而上学，揭示社会的经验法则。它是最后一个进入科学王国的学科，但一旦被接纳，它将统治混乱的领域，从混沌中产生进步的秩序。因此，实证主义既是科学，也是意识形态。」（摘自《延伸个案法》，第 31 页）

「在反身性科学看来，介入不仅是社会研究不可避免的一部分，更是一种值得利用的优点。正是透过相互的反应，我们才能发现社会秩序的性质。介入创造了扰动，这些扰动不该被视为必须清除的噪音，而应被视为值得欣赏的音乐，传递着参与者世界中隐藏的秘密。」（摘自《延伸个案法》，第 40 页）

「难道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值得我们支持巴勒斯坦事业吗？……或许，正在发生的巴勒斯坦大屠杀是所有暴行中最令人震惊、最为野蛮的。它在我们的萤幕上直播；它摆在我们面前；它是无可逃避的。西方列强对以色列的无条件支持，赋予了它世界历史性的意义。对于一位社会学家来说，仅仅表态你站在哪一边然后走开是远远不够的；作为社会学家，我们必须将我们的政治承诺镶嵌在理论框架之中。在一个「后殖民主义」的时代，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系统性且透明化的压迫，使其具备独特性，迫使我们重新审视我们自身的过去，并**在衰败帝国的残骸中，赋予『定居殖民主义』新的意义。**」

这些仅仅是无数段落中极其精采的其中三段。

> 个人影响与公共社会学议程

我现在要分享一些 Michael 对我和我的学术事务的影响。然后，我会谈谈公共社会学。

Michael 于 2023 年退休时，我像他其他学生一样，写了一些追忆文。我想在此分享其中一小部分。我是在 2001 年 9 月开始读研究所。两周后，国会投票决定入侵阿富汗，

世界从此改变。我记得在最初的几周里，Michael 在「社会学 101」课堂上的演讲，他大胆批判了即将发生的战争，并出色地引导了整个教室的学生对 9/11 及其后果进行批判性思考（当时的美国民族主义情绪达到了历史最高点）。我从那时起就知道，我找对地方了。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Michael 开创了公共社会学的议程，这股热潮与能量令人感触深刻，更塑造了我余下的研究生时光。正如 Michael 在《为公共社会学而战》（For Public Sociology, 2005）中写道：「在成功获得博士学位的 50% 到 70% 的研究生中，许多人透过在业馀时间从事公共社会学的工作来维持他们最初的承诺——这种行动往往不为导师所知。」如今，虽然我本身不再有导师，但确实是公共社会学在业馀时间维持着我的学术热情。

Michael 对我当今思想的影响是微妙而深刻、坚如磐石的。我对摩洛哥宗教与疯狂的研究，反映了我透过他学到的 Fanon 在阿尔及利亚的心理分析工作和创伤的社会学根源。我对印度家庭债务的研究，将我带回了他所培养的、我的初恋——马克思主义。确实，Michael 的马克思主义是我的避风港。

我会被 Michael 吸引，不只因为他在知识上以及个人的魅力，更因为我在我研究的一切事物中看到异化与阶级，无论是我对色情产业的看法（我的硕士论文，Michael 是审查委员），还是对穆斯林少数民族政治动员类型的研究（我的博士论文，他担任指导老师，这本论文最终出版成书）。

> 分析性思维的导师，他的宗旨始终是改变世界

Michael 鼓励我在进行民族志研究时，避开霸权性的权力中心和全球大都会，转而将焦点放在我的田野地点（法国和印度）中较边缘的城市。因此，我最终研究了法国东南部的里昂和南印度的海得拉巴。对此我深感感激，因为我得以在边缘地区生活和学习。透过 Michael，我学会了分析性地思考，当我在组织论点时遇到困难，我便会回到他非常喜欢的二乘二表格中，寻找那些原本难以捉摸的清晰度和锐利度。

Michael 当然也塑造了我对民族志的理解。在田野中处理深远的伦理问题和权力关系、研究底层穆斯林社群时，我知道 Michael 在精神上与我同在。我在我的著作的方法论附录中引用了他的话。

再次引用《延伸个案法》中的话：「无论我们站在哪一边，管理者还是工人，白人还是黑人，男人还是女人，我们都自动地捲入了一种支配关系之中。作为观察者，无论我们多喜欢骗自己，我们都站在『我们自己的一边』……（Goldner 1968）。我们的使命或许很崇高——扩大社会运动、促进社会正义、挑战日常生活视野——但知识分子（无论多么有机）与他们所宣称的选民利益之间的基本分歧是无法逃避的。」

>>

Michael 生活并呼吸着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我想他的学生都会同意，他最相信的是改变世界和革命，而非为了理论而理论，或为了知识而知识。这股信念驱动着我所做的一切；事实上，它如影随形地萦绕着我。但在美国社会学界，这种信念却处境尴尬。我记得多年前，我的课堂上有一位学生给了我一个非常负面的评价。他们写道：「Parvez 教授的课没什么用——除非你想成为一名共产主义革命家。」我不知道我该感到冒犯，还是应该将此视为一种荣誉徽章。我想 Michael 会大笑出声并感到骄傲吧。正如 Zach Levenson 在一篇悼文中所写：「Michael 无法忍受经验主义，但他同样厌恶理论主义。他认为，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任务是小心翼翼地航行在这两个陷阱之间。」

Michael 身上另一个值得学习的特质是，他愿意随着世界的变化而改变。同样地，这也忠实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尽管他以一种非常特定的方式教授他的社会理论课长达数十年，但他后来开始拥抱 Du Bois，展开了全新的对话，并开始改变他的理论课。在 Du Bois 之前，他与 Bourdieu 有过长期的交锋。（我记得他曾经以学生的身份选修 Loic Wacquant 关于 Bourdieu 的研究生研讨课，并抱怨他的作业有多多！）我很幸运能成为那群学生的其中一员，与 Michael 一起辩论和争论 Bourdieu 视角的局限与潜力。Michael 对理解和澄清自己的理论视角有着深切的需求，能够参与到这种动能当中，是令人兴奋的体验。

> 意志的乐观主义与继续前进

Michael 曾在 2011 年写道：「Antonio Gramsci 最著名的论断是『理性的悲观主义，意志的乐观主义』。理性的悲观主义指的是社会进程的结构性的决定，使得可能性受到局限。而政治则要求乐观主义，因为它关注集体意志的形成，旨在消解限制并追求不可能之事。……意志的乐观主义呼唤理性的悲观主义，反之亦然。它们是一体两面的存在。」

尽管有一些线索，但我并不确定 Michael 是否认为美国正逐渐陷入危机当中，以及矛盾是否最终将成熟到足以转向社会主义的程度。但 Michael 总是支持，并为当代社会运动感到兴奋，从占领华尔街到巴勒斯坦正义运动，他多年来偶尔会讨论到这些事。

不过，他经常提醒我们，我们的头号公共群体是我们的学生。而且，若将我们的处境比喻为身于一场葛兰西式的阵地战，大学便正位于战场中。对于我们从事教育工作的人来说，我们做重要的任务，也许便是提升学生计程车气，帮助他们看到资本主义体系的核心已经腐败，看到他们能够也必须改变世界。

Michael 总是借由他一直以来的谦逊说法指出：公共社会学在许多全球南方地区——从南非到印度——就是主

流社会学；当他倡导社会学工作必须对公众负责或与公众接触时，他并没有提出特别新的干预。我认为他是在向全球南方的行动者和社会学家学习。

> 有机公共社会学：是过程还是伦理？

他在 2011 年再次写道：「公共社会学不能成为劣质社会学的代名词，它不能是先锋主义或民粹主义，而是必须以我们作为社会学家所了解的知识为基础，旨在（与劳工）展开对话。」（2011:75）

我们必须持续在全球南方和全球北方之间进行这些交流，继续瓦解这种二元对立，迈向 Michael 在其实践中如此体现的真实团结。我们必须持续真正地以多向度的方式分享知识，与基层社群和社会运动分享我们的见解。我们不会总是一致，对于我们这些民族志学家来说，我们的论点可能不总是社群想听到的；但一定要对话和辩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才能前进——这也是构成传统的要素。

根据他 2021 年的一篇文章，我的感觉是，对 Michael 来说，公共社会学日益重要的一点是，它必须超越传统的为媒体撰稿、投书评论和上台等方式，转而与行动者和社群进行「有机公共社会学」的接触。就我个人而言，这是我一直在努力的方向。对于如何实践，没有蓝图可循，我完全是边做边学的。我努力找到社会学分析与理论，以及生活现实和那些深受我们想要对抗的暴力与苦难影响的人们进行面对面沟通的那个甜蜜交汇点；无论是与难民社群、移工，还是在街头抗议的工人阶级行动者在一起。

尽管 Michael 没有深入探讨如何应对权力关系或如何确切地进行这些对话，尤其是在跨越阶级鸿沟时，但我认为我们仍然可以以他为榜样来学习。具体来说，我想知道有机公共社会学究竟是一种过程，还是一种伦理？

Michael 绝不会以这种方式来阐述，但根据他的榜样，我认为有机公共社会学或许必须关乎对科学的承诺，同时也关乎用心与人交往的承诺，以及一种道德信念和品格。

> Michael 的遗产：幽默、活里、乐观主义和伦理，支撑我们在震盪的大地上前行

Michael Burawoy 的哪些特质影响了全球数以百计、或许是数以千计的大家？他充满了开放性、信任他人的直觉、善良而谦逊，并怀有真正的民主精神：他相信人们可以向任何人学习，无论是对他的学生，还是大楼里的清洁人员，这是一种对待每个人都抱持尊重的伦理。请别误会，他也会不耐烦，他丝毫无法容忍知识上的懒惰或故作姿态。但 Michael 拥有横跨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的众多公共群体，而赋予他公共社会学诚信的，正是这种伦理，以及他为人处世的方式。

我对无法再与Michael一同进行这些关于公共社会学和在黑暗时期组织起来的对话深感哀悼。但在我的哀悼阶段中，我思考的是如何将我所热爱的他所拥有的所有特质——他的幽默、活力、乐观主义和伦理——转化为我自己的力量。我认为，这就是所有曾受他影响、并有幸向他学习、接受他祝福的人，现在所要踏上旅程。他在《延伸个案法》中写道：「当我们脚下的大地总是在震动时，我们需要一根拐杖。」对我而言，Michael Burawoy 那浩瀚的著作（我视其为他的诗篇）和他的伦理（我有幸亲眼见证），将成为那根拐杖。 ■

本文基于 2025 年 3 月 1 日，在孟加拉社会理论网路所举办的Michael Burawoy悼念研讨会上的演讲内容。该研讨会的主题为「公共社会学与全球南方」。

初稿曾发表于《柏克莱社会学期刊》([Berkeley Journal of Sociology](#))

来信寄至：Fareen Parvez <parvez@soc.umass.edu>

> 劳动过程与霸权生产： Burawoy 的贡献

Aylin Topal·中东理工大学·土耳其

我首次亲身与 Michael Burawoy 教授会面，是在2013年于安卡拉举行的国际社会学协会 (ISA) 国家协会理事会会议上。当时他正担任 ISA 主席。此后我成为该协会的活跃成员，与 Michael 保持联系，我们时常在协会会议中相聚，并透过邮件讨论重大政治事件。他真的是一位跨学科的社会科学家。身为政治学者的我，正因他那份包容的态度与坚守跨学科问题导向的研究精神，才得以成为 ISA 的一员。

Michael 与我有一位共同挚友：Erik Olin Wright，他于2019年离世。Erik在对抗白血病期间于期刊文章中深刻反思生命、死亡与来世。我记得曾与Michael讨论 Erik的物质主义视角——他主张肉身终将化作星尘归于宇宙，这正是人与浩瀚星河的深刻连结。我深知 Michael 同样秉持这种重归自然的人文主义理念。他不仅将以星尘之姿永存，更将透过其著作持续启迪世人——无数探讨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本质与阶级斗争动态的学者，都将持续阅读与引用他的研究。本文正是为纪念他对学术文献的卓越贡献。

> 劳动力

生产过程在经济理论中占据核心地位。毕竟，经济的定义始于生产，生产可被界定为将具特定使用价值的物品，转化为具不同使用价值的物品。因此，生产对应于新使用价值的创造。正是劳动力作用于生产资料，方能转化物品以产生新使用价值。此种转化及其衍生的新使用价值，唯有当其对应更高交换价值时，方对市场具有意义。

资本主义生产的核心蕴含着一种根本性对立 (central antagonism)。在资本主义市场中，劳动者并不拥有生产更高交换价值所需的生产资料。为实现此目标，资本家必须投资于劳动力。这种劳动力投资对资本家而言不可避免，因为唯有劳动力能独特地转化为物品，创造出超越物品原有交换价值的新交换价值。投资劳动力之所以有利可图，在于劳动者创造的价值高于该劳动力本身的交换价值。工资作为劳动的交换价值，是由社会决定，足以再生产劳动力并维持劳动者家庭的水平。与此同时，资本家必须透过让劳动者工作超过创造等同于工资的新价值所需的时间来获取利润。

因此，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必然超越使用价值与劳动交换价值的生产，延伸至社会生产的剩余价值之生产与私有化。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涉及两方面的关系：其

一，旨在最大化榨取未付剩餘劳动的生产；其二，在最低生存水平之上最大化劳动力交换价值的生产。尽管这些张力深植于生产的社会关系之中，但直至1970年代，关于生产与劳动过程的深入研究与积极辩论仍相当匮乏。

> 开创性的批判性著作

1954年，一群社会科学家试图以比较视角研究各国劳资关系与产业体系，聚焦于经济发展、劳动市场及国家——企业——劳工关系 (及产业关系)。此类研究的核心动机，在于探索工业化的普世模式，同时揭示各市场独特的劳动关系与产业形态——这些形态皆受制于各自的文化与政治脉络。该研究团队由福特基金会资助，最终于1960年由 Clark Kerr 等人合着出版《[工业主义与工业人](#)》。该著作聚焦各国工业化领导者对实际工业化进程路径的影响。这些研究未能突破现代化理论框架，仅强调「工业化精英」在维持稳定与促进经济增长过程中，作为劳资双方中介者的角色。其功能主义的因果关系观、脱离历史脉络的特性及趋向同义反复的倾向，未能在学界圈外引发任何辩论。

Harry Braverman 于1974年出版的《[劳动与垄断资本：二十世纪劳动的贬值](#)》是批判性审视劳动过程在资本主义社会核心地位的先驱著作之一。Braverman 主张，资本主义虽标志着现代技术的兴起，但其发展进程却伴随着工厂与办公室技能的普遍侵蚀。他将资本主义历史解读为大众技能退化的历程——专业技能仅存于极少数工程师与管理者手中，而丧失技能的劳动者沦为可替换的机械附属品。简言之，Braverman 强调泰勒主义「无异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明确表述」。

Braverman的去技能化论述，与Charlie Chaplin 1936年电影《摩登时代》批判工业化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非人化效应的主题惊人地相似。将复杂任务拆解为重复性简单作业，使工人与劳动本质产生疏离，其存在意义与价值感皆被机器吞噬。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技术性分工确实本质上重塑了劳动过程——复杂生产流程并非无差别的整体，而是透过资本主义分工机制在内部产生碎裂。随着生产的不同环节将此过程分割化，劳动者不再参与商品经历的所有转化过程，而通常仅在其生产的特定阶段与之互动。这份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深刻批判启发了其他著作，并成功在跨领域学者间引发关于劳动过程的激烈辩论。

「强制与同意之间的相互作用,掩盖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

> Friedman 与 Edwards 的洞见:民族志研究的必要性

自Braverman揭开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面纱后,论战焦点便集中于一个极其简单却至关重要的问题:工人为何如此辛勤工作?这引导我们追问:工人如何将束缚自身的资本主义基本法则内化?Braverman、Edwards 与 Burawoy 对此提出批判性回应。Andrew Friedman 强调资本主义劳动控制的另一面——更具人性的面貌。他主张,相较于直接管控或监督,工人被赋予一种「负责任的自主性」,使其能舒适地认同企业目标。Friedman 着重揭示管理控制因工人抗争策略而产生的变异性与适应性。同样地, Richard Edwards 则对职场关系的互动性与策略性本质提出更细腻的观点。

Edwards 指出,Braverman 的分析倾向于将泰勒主义的主要特征概括化,并将其套用于整个资本主义历史。泰勒主义的科学管理原则在二十世纪的劳动过程控制中留下了鲜明的印记。然而,它仍应被视为控制管理的一种形式。Edwards 辨识出三种模式:简单型、技术型与官僚型,每种模式代表不同的管理策略。他提出「争议性」职场的概念,此类场域的控制权未必绝对,而是持续在劳资双方间协商形成。因此相较于 Braverman 对劳动者的被动描绘,Edwards 着重强调职场关系的冲突本质与劳动者的抗争。尽管 Friedman 与 Edwards 皆将劳动者的能动性纳入分析,却未能充分解答这些令人困惑的问题。

要解答「工人如何在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同意自身被剥削」的命题,研究者需具备极致的同理心。在社会科学领域理解研究对象的视角,本就是复杂且充满挑战的任务。研究者必须暂停预设与理论偏见,方能真实把握他人的生命经验。然而真正的同理心终究有限,因研究者的视角本身即受其社会脉络所形塑。为突破同理心的侷限,研究者需直接接触研究对象的现实处境。因此,唯有透过民族志研究,方能解答这些关于劳动过程的关键问题。

> Burawoy 的基础思想

Michael Burawoy 不仅具备非凡的学术严谨性,更拥有深刻的同理心、谦逊态度与反思精神。凭借这些特质,他为劳动过程论辩作出贡献。他与其他学者的主要差异在于:他并非从研究者遥远的客观立场解答问题,而是从自身作为工厂工人的主观经验中推导出答案。他投入大量时间在工厂工作,这段经历深刻塑造了他对职场动态、工人同意机制,以及劳动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之间相互作用的理解。

其著作《制造甘愿: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历史变迁》正是基于他在芝加哥联合公司机器加工厂的工厂工人经历。Burawoy 精准地从「工人如何主动承担并再生产管理阶层角色」的疑问切入。他指出,这些问题的答案应在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内寻求,因为该过程同时制造着认可与商品。类似于 Friedman「负责任的自主性」概念化案例,Burawoy 指出工人自觉他们具有选择权。

正是这种选择的幻觉,使工人主动内化了资本主义对劳动过程的控制规则。身为机械操作员,Burawoy 亲身经历了工厂车间的日常运作与人际互动。他叙述自身如何承受生产配额的压力、管理层的控制,以及在应对这些压力时工人间的互动关系。他提供了宝贵细节,揭示工人如何试图超越生产配额以换取奖励或额外的休息时间。他主张这些被称为「赶工」的游戏化策略,实质构成了对自身剥削的默许。他更指出,过度强调「控制」概念反而模糊了资本主义的真实运作机制——劳动过程中强制与同意的相互作用,正是掩盖资本主义剥削本质的关键环节。

>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后殖民社会中的生产政治

他后来在1985年出版的《生产政治学》一书中,将这些基础思想拓展至更广阔的全球宏观层面。该书聚焦于不同时空背景下的生产政治与制度框架,提出「生产政治」由国家政策、劳动市场及阶级斗争动态所决定。在这些决定因素下,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后殖民社会中的劳动组织与生产现场,被塑造成各异的劳动体制与生产政治体系。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他强调管理层的重要性,因其以利润最大化为优先目标。他指出劳动法、福利政策与意识形态元素如何维持对劳动者的控制。在苏联的国家社会主义体制下,由于国家优先事项与劳动者需求存在落差,劳动者与管理者在官僚控制权的协商中往往导致冲突关系。这些要素催生出社会主义生产政治,既提供制造共识的不同诱因,亦建立抵抗机制。最后针对后殖民生产政治,Burawoy 将分析层级提升至全球规模,阐释帝国主义关系如何持续主导后殖民语境下的劳动过程。他对全球资本主义如何塑造劳动体制的阐述,奠定了其对新自由主义劳动过程的观点基础。

> Burawoy 将 Marx 的分析转化为可操作的理论框架,强调生产力的必然性

透过这两部互补著作,布劳威建构出理解劳动过程的完整框架,将劳动者的日常经验与更广泛的政治经济力量相连结。因此他强调串联不同层级分析的重

>>

要性,并指出作为资本主义劳动过程要素的「控制」与「同意」应被视为一体两面——二者对应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双重本质。他阐明劳动者在职场中同时经历赋权与压制,此乃特定生产关系概念与状态建构霸权的必然环节。

Burawoy的分析必然将劳动生产力的迫切性置于首位。他有效地将Marx对劳动过程的分析转化为可操作的理论框架:

劳动生活客观上围绕生产力进行组织→正是生产力创造了剩余价值→资本尽可能地自我增值,是资本家的核心驱动力→当货币所有者在市场上发现并取得自由劳动力时,货币便转化为可积累的资本→集体中的社会劳动比个别工人更具生产力。更精确地说,劳动作为集体力量才具生产性→资本主义的目标在于尽可能提高利润率→为实现更多的积累,资本家从大量工人手中购买劳动力,以提升社会劳动的生产力→因此,众多工人被雇用并并肩工作,无论是在同一生产流程中,或在相互关联的不同流程中,皆为提升生产力。这条论证链引领我们理解Marx所称的「工人合作」。更进一步,工人合作是依据管理者与监督者代表财产所有者所制定的计划来进行的。

Burawoy的框架指出,劳动分工并非目的,而是提升生产力的手段。因此资本主义体系透过劳动生产力自我延续——劳动生产力的提升意味着剩余价值的增产。提升生产力的根本途径之一在于深化技术性劳动分工。故管理职能在于促进生产力,而非必然执行劳动分工。表面看来,劳动者各自生产商品的局部,但生产实为社会过程。整体产品乃集体劳动所创造。故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在将工人转化为孤立个体的同时,亦透过维持其作为集体劳动力的组成部分,同步建构霸权。正如Marx所言,社会生产的集体力量源于将劳动组织为「单一生产体」,其目的在于提升生产力。

> Burawoy 关于阶级霸权生产的框架

Burawoy(与Marx相同)指出,资本家及其管理阶层严格控制劳动过程。劳动服从资本的现象,实质上源于工人为资本家工作并受其控制的客观事实。本质上,资本的指挥权界定了劳动过程本身的运作要求。为促进和谐合作与生产性组织的发展,指导权力不可或缺。因此,指导、监督与调整劳动过程的工作成为资本的功能之一。然而,资本家控制劳动过程的动机不仅限于提升合作与生产力。资本与劳动本质上始终处于对抗状态,双方争夺工作时间的控制权与剩余产品的分配权。管理与监督是遏止职场反抗浪潮的重要工具。Marx的分析中始终暗含着「同意」的要素。然而,由于Marx主要撰写的是政治文本(相较于Burawoy的社会学文本),他并未探讨劳动阶级如何以及为何同意管理阶层的统治。

Burawoy的研究为审视阶级霸权的生产提供了一个富有洞察力的框架,它聚焦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如何阻碍对立形式的意识的兴起。然而,他指出,

由于生产定额的压力、严格的监督以及重复性的工作,工人在工作场所常常感到不满和沮丧。这并非精确意义上的阶级意识,而是以新的行动模式表现出来的对立意识。尽管工人清楚地体认到企业是通过榨取他们所创造的剩余价值来盈利的,但他们的诉求仅仅是尊严和自主权。因此,工人与生产资料的客观关系确实会产生冲突,这些冲突以「阶级方式」塑造了工人的经验。正如Thompson所指出的,阶级总是以不满和挫折的形式存在,但这些紧张关系并不一定以阶级意识的形式表现出来。

Burawoy运用了Gramsci的霸权框架,该框架将同意、强制与集体意志形成的时刻结合起来。Gramsci提供了一个丰富的理论与概念框架,有助于我们理解在实践的整体性中个体主观性的转变,即集体意志形成的过程。Burawoy的叙事描绘了工人的日常经验如何彼此分歧,从而破坏了他们的集体身份和集体意志的形成。这就是为什么工人之间相互竞争,例如,为了达到个人额外福利的配额。他们的个人经济利益可能使部分工人难以团结一致。

正如Filippini所指出的,Gramsci将个体定义为在与社会的关系中形成的分层且矛盾的存在。因此,个体被视为由常识塑造的「集体人」(collective man),在意识形态领域中不断变化。尽管Burawoy在《生产政治》中并未深入进行国家层面的分析,但他指出了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性。然而,Burawoy强调他所指涉的美国语境,其中工人阶级缺乏政治和知识领导力,这导致工人之间的相互竞争。因此,分层且矛盾的个体利益是工人无法将其利益转化为集体有机体的结果。

正如Panitch和Gindin所指出的那样,Burawoy将工会视为工人阶级的核心霸权机构,能够将工人阶级的不同部分纳入对话之中,并在他们不同的实践之间进行沟通。很明显,在缺乏集体政治能动性的情况下,劳动过程本身不会让工人阶级的不同群体基于利益的团结超越其经济——企业层面的局限,即便是在纯粹的经济领域也是如此。更糟的是,在全球新自由主义的冲击下,工人逐渐失去工会作为下层阶级行动的主要政治组织的能力。

> 替代结论

Burawoy的研究基于两项命题:一、劳动者生活的根本现实是在工作场所中塑造的;二、劳动过程的变革与资本主义结构的转变密切相关。基于上述命题,仍需针对新自由主义对工作组织的转型及其对工人集体意志形成的冲击进行分析。

新自由主义时代加速的私有化进程,显然对私有化企业的工人造成实质影响——他们往往面临集体失业与丧失社会权益的处境。然而,工人对这些私有化政策却仅展现出微弱的不满迹象。针对私有化过程中未显现不安征兆的现象,尚需深入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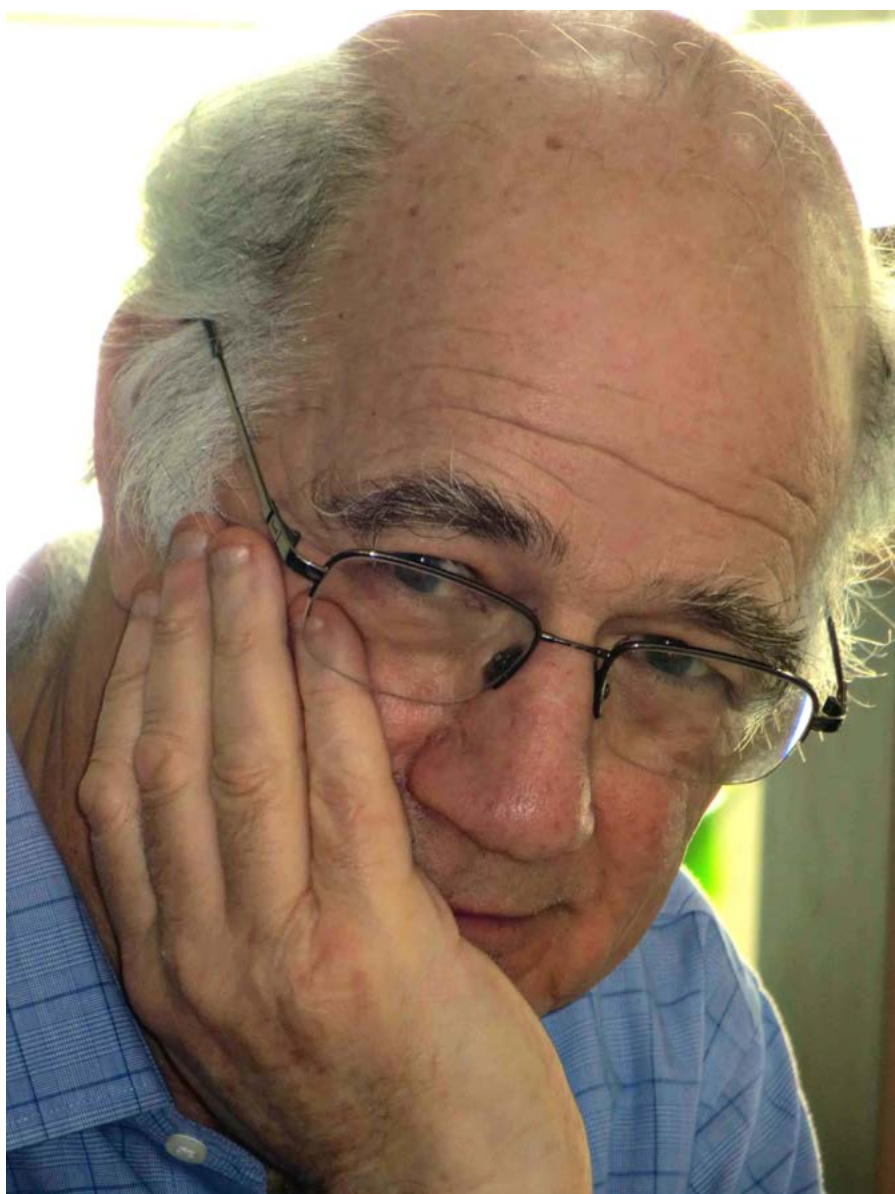
新的研究应凸显劳动过程与劳动者谋生经验的核心地位,并分析新自由主义下的霸权与反霸权动态。值得注意的是,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劳动者在职场的经验可能呈现差异性。新的研究不应试图识别与分析统一且连贯的新自由主义劳动过程,而应采取初始立场,反映劳动过程在经济不同领域呈现多元形态的观点。Michael Burawoy 的方法论与概念框架,将持续引导新生代民族志学者理解其田野工作经验。■

来信寄至:Aylin Topal <aylintopal@gmail.com>

> 与Michael Burawoy 的相遇与辩论

Ari Sitas, 开普敦大学及斯泰伦波斯大学, 南非

Michael Burawoy 在乌克兰基辅国立大学莫赫拉学院的演讲。照片由Volodymyr Paniotto拍摄，来源于维基百科。



我是在 1979 年受到我的老师 Eddie Webster 介绍了 Michael Burawoy 的著作。他拿着一本刚出炉的书《[制造甘愿：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历史变迁](#)》走向我。他坚持我一定得在我替他在 Wits 大学授课时使用这本书。他坚称：「这本书是完美的课堂读本，与 Huw Beynon 的《Working for Ford》结合，将构成这门

课程的核心。」于是，我便开始试图理解，工人如何透过在工厂车间里的各种游戏与因应机制，来获得并维持霸权。这本书源自他在一个与 1920 年代 Elton Mayo 曾研究过的场景相似的工厂工作的经验，那里的工人透过非正式的团结网路来因应压力。但与 Mayo 不同的是，Michael 之所以在那里工作，是因为他要从一家工厂到另一家工厂，去

>>

探究生产中的政治。这便是他第二本书《[生产的政治：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下的工厂政权](#)》所带来的礼物。

后来我也发现他与 Eddie Webster 以及大众史学家 Luli Callinicos 的关系十分紧密——他们都是我的导师，而自从我们在 1989 年杜班 (Durban) 第一次面对面见面后，他也把他的友谊与关怀慷慨地延伸给我。他对我们在激进工会运动中的工人剧场运动里所做的工作，以及我们如何实践自己的「公共社会学」，深深着迷。我们激烈辩论着环绕在我们四周、深陷于所谓纳塔尔内战 (Natal Civil War) 的社会运动前景。

之后，他两度在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社会学系接待我，分别在 1993-1994 年与 1999-2000 年。他确实把我从一项痛苦的任务中解救出来——那就是担任内战和平协定中媒体与文化委员会的主席。在那里，我们被要求白天向媒体「包装」进展，而晚上又得面对暴力再次开始。那是一段难忘的岁月，他把我介绍给他的许多同事与朋友——Peter Evans、Michael Watts、Gillian Hart、Asef Bayat、Michelle Williams，甚至 Manuel Castells——他们全都倾听并关心南非的转型。当时麦可已深深被「后公开化」(post-glasnost) 俄罗斯吸引，因此转型比较在研讨会上满天飞。我则必须回到南非，在第一次真正的民主选举中担任非洲国民大会 (ANC) 的投票监督。

我至今仍记得 Burawoy 戴着安全帽、骑着他那台运动型脚踏车在奥克兰 (他住处) 和校园，以及接近 Monterey Market (我们住处) 之间穿梭的模样，而他不停地说：「你一定要读这个」、「不，去读那个」，让我们的讨论持续向前。那时我越来越熟悉他试图在理论上为那些让他成为社会学重要人物的民族志研究工作辩护的努力。

在往后的多年里，我们有许多次会面，因为南非逐渐成了他的第二个家：2010 年我刚搬到开普敦大学时，他立刻来拜访我，并介绍我认识他的老友 AnnMarie Wolpe。这位年长的女性主义者当场抓住我，要我加入 Harold Wolpe Trust，以纪念另一位朋友和社会学家。他也想参与我 [Mandela Decade](#) 一书的发表会 (由该信託主办)，但他当时有紧迫的国际行程。他也试图在他担任 ISA (国际社会学协会) 主席期间让我与他合作，但在我已花了八年时间推动该协会的齿轮与轴心之后，我已经筋疲力尽。

2012 年，我与他在德里 Ambedkar 大学被 Suman-gala Damodaran 组成同一场辩论会，讨论我们各自在工厂现场与工人阶级社区所做的质性研究。我们对真与假意见相左！我的意思是：他进入工厂空间的途径，是不揭露自己的真正目的，并将他的马克思主义影响稀释成类似人资语汇的说法！但我在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并无法透过管理阶层的网路取得进入途径，而是透过工厂的工会代表与工会官员。我们也对「民族志」(ethnography) 一词意见不同——由于我有某种希腊血统，我始终对这个意指将「ethnos」刻写到你的研究对象身上的字眼抱有反感！

之后，我们又在约翰尼斯堡见面，当时他正与另一位好友 Karl von Holdt 合作撰写关于布迪厄的书。然后在弗莱堡线上再度相遇，讨论公共社会学与社会学思想的流通，由我们的朋友 Wiebke Keim 主持。还有一次在开普敦，讨论大学体制与其新的管理风气。最后，我们再次在约翰尼斯堡聚首，向我们的朋友 Eddie Webster 致敬，由 Sarah Mosoetsa 与 Michelle Williams 主办。他也同时向另一位退休但勇敢无畏的朋友 Jackie Cock 致敬。

几周之后，Michael 便在奥克兰去世了。

我们失去了一位杰出的职场社会学家、社会学实践者，以及一位能将社会学的宏观与微观趋势加以统整的伟大统合者。我脑中依然留着他那不安分、充满剧场感的身影：踱步、粉笔、他为了表达分类而画出的象限、他的笑声，以及他对我们所逐渐变成的残暴姿态所表露出的恐惧。他留给我们的的是他对威权民粹主义与种族灭绝式暴力崛起的反思。■

来信寄至：Ari Sitas <arisitas@gmail.com>

> Michael Burawoy: 全球南方社会学者的灯塔

Shaikh Mohammad Kais, 拉杰沙希大学, 孟加拉

Michael Burawoy教授始终是众多全球南方社会学者的灵感源泉。他挑战「单一社会学普世适用」的观念,并热切捍卫「全球多元社会学」的存在价值。其著作与演说强调社会学在南方地区的核心地位,质疑全球知识劳动的等级划分,并主张理论根植于社会的真实经验。

在孟加拉从事研究期间,我深受他关于去殖民化与解放社会学的观点影响。而我结识 Michael的机缘,是2008年Syed Farid Alatas教授邀请我参与2009年的台北会议。当时,我仍是毫无把握的菜鸟研究者,但Michael展现了他的慷慨胸襟,在我的第一次参与国际会议的摘要与论文上,协助与给予了我修改建议。这份鼓励,我永志不忘。那时,我亦获Raewyn Connell教授等资深学者支持,这些经历都更坚定了我探索独具南方特色的社会学之路。

Michael著名的四种社会学类型框架——专业型、政策型、批判型与公众型——促使我反思孟加拉社会学的现状。在此反思中,我发展出后来称为「混合社会学」(hybrid sociology)的概念。此概念意指一种高度依赖北方理论与方法,却又仰赖南方实证数据的社会学。这种混合状态本身就是一个危机征兆:因为南方学科受制于北方的依附关系,使得南方社会学无法完全拥有具自主的知识基础。在全球南方多数地区,社会学就是依上述的方法成形——这是一种汲取外部典范,却忽视本土知识与自身社会的现实的状态。

这样的混合现象并非偶然间产生,而是出现在具备若干共同条件的社会之中,也就是一种对外部学术资源的高度依赖、外来思想对本地创造力的压抑、殖民遗绪的持续影响,以及全球知识体系中南方学者边缘化的处境。这些条件共同催生一种向外寻求认可与验证的社会学,而非培养对自身智识资源的信任与信心。

孟加拉正是一个鲜明的例证。在我的国家,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其边界始终模糊不清;在理论、方法与制度层面皆处于弱势状态。大学体系深陷结构性与行政上的双重危机,学术研究往往依附于欧洲中心的知识框架,而非建构植根于在地现实的理论体系。专业学会的力量薄弱,而高等教育中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更进一步侵蚀了发展自主

学科领域的可能性。在此脉络下,就出现了我所谓的「混种社会学」——一种映照我们学术世界内部张力、依附与危机的知识形态。

然而,这场危机同时也孕育了转化的契机。要重塑孟加拉及其他全球南方社会的社会学,我们必须从根本上推动改革,例如重构课程体系,发展立足于本土知识的理论与方法,彰显社会学对社会实践的价值与意义;同时,也可以尝试强化国家与区域层级的学术组织,培养一批胸襟开阔、具自我反思能力的学者,使他们能以批判与责任并行的态度回应社群需求。

在这些理念形成的过程,Michael的影响深远而关键。他不仅以理论上的洞见启发我,更亲身参与我对「混种社会学」的构思与探索——细读我的草稿、提出精准的回馈,并鼓励我不断精修出精准的论点。最令我难忘的是,他除了拥有卓越的智慧与学术视野,他的真诚、谦逊也令人深受感动。对一位来自孟加拉、默默无闻的年轻学者而言,能获得全球社会学领军人物如此专注的关怀与鼓励,既是莫大的荣幸,也成为我持续前行的深刻动力。

除了学术上的深远影响,我永远不会忘记麦可温暖又充满人性的光辉。在各类学术场合中,他总是平易近人、幽默风趣,并慷慨地拨出时间与人交流。我记得有一次在台北的会议上,他主动询问我对中央研究院的餐饮与接待有何感想,随后还打趣地说:「既然Shaikh说好吃,那就一定是很不错!」那一刻,我被他的亲切与幽默深深感动。2023年墨尔本世界社会学大会上,我如同狗仔般紧随在他身后,只为了与他合影留念。他笑着看我滑稽的举动,并以夸张又风趣的姿态配合演出。后来,当他得知我当选国际社会学协会(ISA)执行委员时,送上的祝贺充满真诚与喜悦,让我再次感受到他发自内心的支持与鼓励。

对我而言,Michael始终是一座灯塔。正如船只仰赖航标穿行于黑暗之中,我亦倚靠着他,在这片错综复杂、常令人困惑的全球社会学海域中,才得以找到方向。他的思想遗产——对公共社会学的理想、对全球北方知识霸权的批判,以及对实践性与去殖民知识的坚定捍卫——深刻地塑造了我的学术生涯,并将持续引领全球南方无数学子的前行之路。

「公共社会学、对北方霸权的批判、 对参与与去殖民知识的辩护」

Michael还创办了国际社会学协会的期刊《全球对话》(Global Dialogue)，为世界各地的学者与思想者搭建了交流的平台。我们在孟加拉的团队曾计划以该期刊名义举办国际会议，我原本盼望能邀请他亲临达卡。然而，这个愿望如今已无法实现。

亲爱的Michael，您的身影将永远铭刻在我心中。您以思想与行动照亮了我们的道路。愿您安息。■

来信寄至：

Shaikh Mohammad Kais

<skais11@yahoo.com>

> 纪念Michael Burawoy:

一个探讨南非小型公车计程车产业的马克思视角

Siyabulela Fobosi, 福特海尔大学, 南非

Michael Burawoy是社会学界的指标性人物, 尤其在公共社会学的领域中, 他的民族志方法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洞见重塑了我们对劳动、资本主义还国家权力的理解。他的作品提供后续学者一种分析资本主义经济下剥削与抵抗机制的批判视角。为了颂扬Burawoy的学术贡献, 我们发现他的理论在当代的研究中仍具有深远影响, 包括对南非小型公车计程车产业的探讨。

Burawoy出版于1979年的经典之作《制造甘愿》, 奠定了工人在资本主义体系下如何面对剥削的理论基础。他揭示工人往往在工作场所的制度结构以及国家政策的运作中, 被动地接受自身受支配与压迫的处境。他对国家干预和资本主义改革的批判, 提供了一个剖析非正式劳动市场的有力框架。此一理论在南非小型公车计程车产业的应用尤为贴切, 这是一个非正式却极为重要的产业, 它源起于种族隔离时期, 至今仍在高度不稳定的劳动条件下持续运作。

南非在1980年代开始放松对产业的管制, 允许企业快速扩张, 如此作为与Burawoy「策略性选择」的概念相呼应。在这样的国家政策下, 政府有意识地偏袒正式的资本主义企业, 使非正式经济遭到忽视与边缘化。这样的理论视角可以解释为什么像计程车汰旧换新计画 (Taxi Recapitalisation Programme, TRP) 等持续性的政府干预, 无法有效改善小型公车计程车司机的生计; 反而只是持续服务于资本利益, 持续推动公共建设的现代化, 却忽视劳动条件的改善。

我与其他学者对小型公车计程车产业所提出的社会学研究, 正好呼应了Burawoy对劳动碎片化以及劳工结构性剥削的洞察。我的研究阐明了小型公车计程车司机如何在没有合约、福利和法律保障的情况下, 面对持续的经济不安全, 并在市场导向的竞争中不断失去议价能力。我对国家政策的分析强化了Burawoy的论点, 指出资本主义结构下的改革多侧重于经济效率而忽略了工人的权利。

正如Burawoy提醒我们的, 如果想促成有意义的改变, 我们需要的不只是政策的转向, 更需要组织化的抵抗以及结构性改革。透过应用他的马克思理论框架, 学者与社会运动者可以提倡以保护劳工为优先的改革、公平合理的政府补助以及小型公车计程车司机的集体议价能力。这些努力不只是为了纪念Burawoy思想遗产, 更是为了推动非正式劳动领域正义的重要实践。



1982年修订版《制造同意书》封面。
图片来源: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Michael Burawoy对公共社会学的投入, 彰显了以学术实践介入社会不公的必要性。他的研究成果持续引领着那些致力于剖析资本主义矛盾并倡导公平劳动关系的人们。在纪念他的学术贡献之际, 我们重申了社会学在促进更公正、更人道的社会中所佔有的重要角色。■

来信寄至:
Siyabulela Fobosi
<sfobosi@ufh.ac.za>

> 可行乌托邦的元素周期表

David Goldblatt, 独立社会学家与记者, 英国

THE PERIODIC TABLE OF A FEASIBLE UTOPIA

1 L _o LOVE																	2 F FAMILY				
3 H _o HOPE	4 C _a CIVIC ACTIVISM															5 G _e GENDER EQUALITY	6 A ART	7 P PARTIES	8 F _{nd} FRIDAY NIGHT DINNER	9 L LESBIAN	10 F _r FRIENDSHIP
11 E _m EMPHASY	12 S _o SOLIDARITY															13 R _j RACIAL JUSTICE	14 P _y POETRY	15 C _c CEREMONIES AND CELEBRATIONS	16 J _{zz} JAZZ	17 G _o GAY	18 R _o ROMANCE
19 C _o COMPASSION	20 M _a MUTUAL AID	21 D _d DAY DREAMS	22 S _h SOCIAL HOUSING	23 W _k WALKING	24 P _m PLAYGROUNDS AND HEADGONES	25 R _d REDUCE	26 G _{nd} GREEN NEW DEAL	27 U _{bi} UNIVERSAL BASIC INCOME	28 R _w REDISTRIBUTION OF WEALTH	29 W _x WEALTH TAX	30 R _j RESTORATIVE JUSTICE	31 N _d NEURODIVERSITY	32 R _k RANDOM KINDNESS	33 F _e FESTIVALS	34 P _s THE POKER SCHOOL	35 B BISEXUAL	36 S _x SEXUAL ECSTASY				
17 R _o ROOTS	38 C _z CITIZEN Juries	39 P _d PORTABLE PARADISE	40 P _p PEOPLES PALACES	41 C _y CYCLING	42 U _f URBAN FORESTS	43 R _p REPAIR	44 C _e CLEAN ENERGY	45 U _{hc} UNIVERSAL HEALTHCARE	46 F _w FOUR-DAY WORKING WEEK	47 C _x CARBON TAX	48 D _l DRUG LEGISLATION	49 D _r DISABILITY RIGHTS	50 S _d SINGING AND DANCING	51 F FEASTING	52 H _s HOT SAUNAS	53 T TRANS	54 N _g NEIGHBOURHOOD				
55 L _a LAUGHTER	56 D _c DECENTRALISATION	57 I _c IMPROBABLE CONNECTIONS	58 P _t PUBLIC TRANSPORT	59 S _k SKATING	60 C _f CITY FARMS	61 R _c RECYCLE	62 R _a REGENERATIVE AGRICULTURE	63 U _{cc} UNIVERSAL CHILD CARE	64 U _w USEFUL WORK	65 L _w LANDVALUE TAX	66 E _p EMPTY PRISONS	67 R _c RIGHTS OF THE CHILD	68 P _l PLAY	69 G _t GOOD TIMES	70 S _w SWIMMING WITH PILES	71 Q QUEER	72 C _t COMPLAINTS				
87 B _a BALANCE	88 P _v POLITICS AS A VOCATION	89 C _t CRITICAL THINKING	90 P _s PUBLIC SPACE	91 P _d PADDLING	92 R _a ROOFTOP ALLOTMENTS	93 R _x RELAX	94 R _w REWILDING	95 U _{sc} UNIVERSAL SOCIAL CARE	96 L _i LIFELONG LEARNING	97 F _x FINANCIAL TRANSACTION TAX	98 P _f THE PLEASE FORCE	99 I _{fg} INTERESTS OF FUTURE GENERATIONS	100 T _h THERAPY	101 G _d GOOD DEATHS	102 U _p UNUSUAL PEOPLE	103 + PLUS	104 C _e CHANCE ENCOUNTERS				
1 FUNDAMENTALS	2 MICROPOLITICS	3 IMAGINABLE	4 CIVIL CITIES	5 SELF-PROPELUSION	6 URBAN BOTANICALS	7 CIRCULAR ECONOMY	8 ZERO CARBON	9 UNIVERSAL WELFARE	10 LIFEWORK	11 TAX JUSTICE	12 UNHOSTILE EMPLOYMENT	13 THE RIGHT STUFF	14 FOOD FOR THE SOUL	15 COLLECTIVE ENERGY	16 WINE ALL NINE	17 NOW IT'S SO QUEER AS	18 SOURCES OF INTRICACY				

©David Goldblatt www.feasibleutopias.org

「可行乌托邦的元素周期表」是David Goldblatt创作的一件艺术装置，将化学元素取代为一个理想且合理的社会组成部分。

我并不确定元素周期表的灵感究竟是哪里来的，但姑且就归因于封城期间的疯狂吧。然而我确知其中蕴含了多重元素。儿时初次在百科全书中邂逅它时，便为那些彩色矩形排列的视觉愉悦与神秘命名法深深着迷。身为化学系毕业生，我始终敬佩并惊叹于其蕴含的科学智慧与智性优雅。身为 Primo Levi《元素周期表》的读者，我欣喜地发现这张表格竟能转化为如此丰沛的隐喻疆域——既是电子结构的网格，亦是情感结构的框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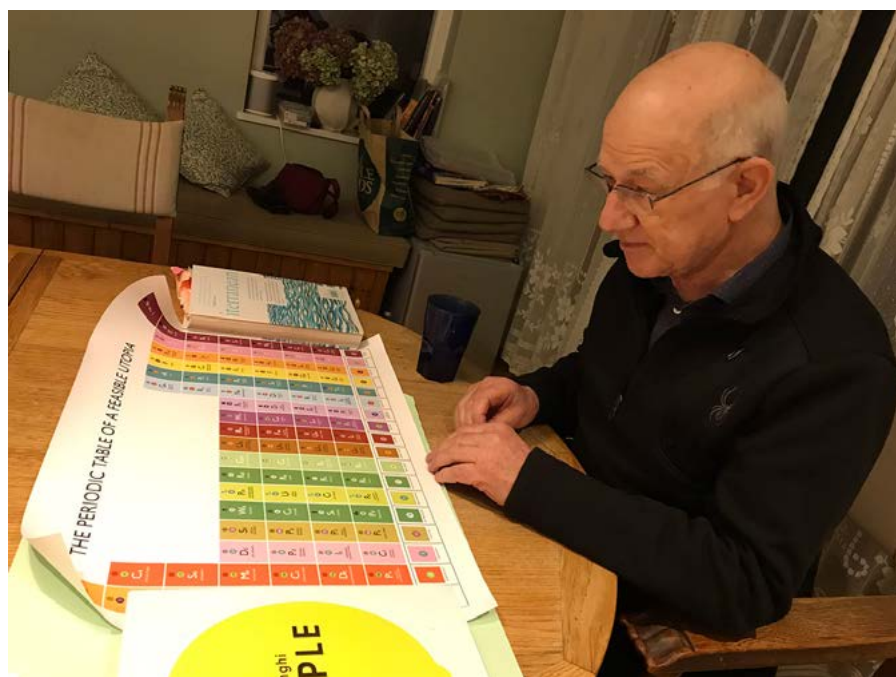
当然，另类周期表未曾有缺——随意浏览网路，你会发现咖啡版、约克郡版、脏话版，有些滑稽，有些严肃，但 Mendeleev 值得更好的诠释。更深邃的？更惊人的？我曾思索各种宣言——艺术的、诗意的、政治的及其他——并疑惑：在注意力如此支离破碎、意识如此碎片化的时代，这些文本是否因过于冗长、过于文字化、过于线性而难以存续？在 Instagram 时代，乌托邦宣言该是什么模样？我的答案——而更多答案尚待发掘——便是《可行乌托邦元素周期表》。

它最初以铅笔与钢笔的姿态诞生于素描本，随后转为数位形态，再被印制在硬纸板上，悬挂于某个艺术计画借予我的巨墙上，静静伫立一个午后。后来我制作了海报——就像你眼前 Michael 正在审阅的那张——并在布里斯托尔市中心某座破旧商场的闲置店铺里，搭建起这张「周期表之桌」。

我们将店铺改造成名为「乌托邦化学」的药房，邀请公众探索元素周期表。若访客驻足，我们便告诉他们：我们并未垄断智慧。在他们心目中的乌托邦愿景里，是否存在想添加的元素？若有，我们便把它制造出来。我们会印制两张该元素的明信片，将其中一张赠予访客，另一张则张贴于墙面，以此创造第二件艺术品：《属于民众的、可行乌托邦元素周期表》。

Michael Burawoy 对《可行乌托邦元素周期表》极为推崇，视其为 Erik Olin Wright「真实乌托邦」概念的视觉化呈现。我认为 Michael 会热爱这个互动且通俗的版本，尤其那些关于世界可能样貌的疯狂、亲密且不拘一格的对话——对话对象往往是那些未能充分畅想乌托邦的人们。我想这或许适用于我们所有人。 ■

来信寄至：
David Goldblatt
<tobaccoathletic@yahoo.co.uk>



Michael Burawoy 兴致勃勃地看着一张「可行乌托邦元素周期表」的海报。2024年，伦敦。



前来参观英国布里斯托购物中心「可行乌托邦元素周期表」装置艺术的访客，被邀请提出自己的建议，以创造第二个「人民」元素周期表。

> 属于社会学的时刻

国际社会学会 (ISA)

当国家领导人鼓吹对科学的不信任,对社会科学的攻击日益加剧之际;

当假新闻的传播范围与影响力超越基于研究的分析之际;

当众多政治领袖散播仇恨言论,剥夺部分民众享有完整公民权之际;

当整类人群再度被非人化,成为巩固权力的普遍手段;

当科学证据遭否认,只为回避系统性环境与社会危机;

当国家镇压那些揭露种族灭绝、系统性暴力与种族主义的异议者;

当空前财富集中使少数亿万富豪掌控大众与社交媒体;

当人类面临相互关联的全球性危机,这些危机将决定未来世代的命运;

当学术自由遭受威胁,即便在成熟民主国家亦然;

我们坚信社会科学家的批判性介入比任何时候都更为关键。

我们重申作为研究者、教育者与公共知识分子,我们工作核心的价值观与承诺。

我们主张:

- 基于事实与分析的严谨社会学,拒绝简单叙事,拥抱世界的复杂性;
- 独立的社会学,提醒我们权势者的话语未必真实,千遍重述的谎言终究是谎言;
- 批判性社会学,质疑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现象,挑战白手起家神话、市场与消费主义的简化论述,以及顶尖男性气质的迷思;
- 公共社会学,参与公民辩论时不居高临下自诩智识优越,而是与致力变革社会、捍卫公共利益者展开对话;
- 一门通论性社会学,抵御过度专业化与碎片化的风险,直面当代急迫课题;
- 一门全球性社会学,向世界各地的研究者与社会行动者学习如何理解并应对二十一世纪的挑战,共同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知。

「社会学已成为要共同生活在地球上 不可或缺的工具」

我们坚信社会科学与学术自由乃民主之本，必须加以守护与促进。

我们认为，基于充分资讯、历史根基与社会学相关性的公共辩论，对于理解并应对当代危机至关重要。

我们确信，社会学不仅能帮助我们理解世界，更能协助建构更公正、宜居、和平且永续的未来。

在气候变迁、战争、日益加剧的不平等与仇恨的时代，社会学已成为人类在有限地球上共存不可或缺的工具。

此宣言由 ISA 协会主席 Geoffrey Pleyers 于 2025 年 7 月 6 日在拉巴特举行的第五届 ISA 论坛上发表。本宣言获得 ISA 历任主席 Sari Hanafi、Margaret Abraham、Michel Wieviorka；现任副主席 Allison Loconto、Bandana Purkayastha、Elina Oinas、Marta Soler；以及欧洲社会学协会主席 Kaja Gadowska、拉丁美洲社会学协会主席 Jesus Diaz、拉丁美洲社会科学 (CLACSO) 理事会主席 Pablo Vommaro 共同支持。 ■

Rabat 2025 年 7 月

我们正收集社会学家个人及社会科学界成员的联署支持。
[请填写此表格](#)，加入我们的行列，共同签署这份承诺与团结的集体声明。



